

2002

10

总第 127 期

炎黄春秋

送刘英大姐西行

萧克临危受命：四次城市保卫战

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

任仲夷：病中随想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八达岭长城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1 送刘英大姐西行……………何 方
7 萧克临危受命:四次城市保卫战……………陈 靖
14 “民主三号”触礁之后……………周 奋

亲 历 记

- 16 亲历民权门恶战……………杨昭仁
21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张登善
23 “天天读”备忘录……………雷 颐
26 我奉命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华人助理出境 马尔韦·赛兰

读 史 录

- 28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读季羨林《牛棚杂忆》书后……………李 普
36 突破标准答案
——读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林京耀
38 彭德怀的厄运是如何注定的
——重读《庐山会议实录》感言……………汪澍白

春 秋 笔

- 43 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陈徒手
48 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傅国涌

一 家 言

- 51 病中随想……………任仲夷
52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李一鑫

求 实 篇

- 56 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何 蜀
61 鲁迅与左联解散……………刘小清

人 物 志

- 66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杜 林

文 荟 园

- 70 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魏家骏
75 一首当代名诗及其作者之谜……………袁小伦
76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张西帆

古 镜 台

- 77 欧阳修忠君误国……………官伟勋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刷: 唐山市丰润区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送刘英大姐西行

● 何方

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著名女革命家刘英大姐，在只差三年就要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却突然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

我与刘英大姐相识 60 余年，在张闻天和她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也有 10 多年。张闻天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刘英大姐则是名副其实的师母。在我们的关系中 20 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又恢复了联系，而且来往密切，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亲如家人。她的逝世自然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遐思，不但我们近 40 年的相处浮现脑际，而且还联想到她革命的一生。在我看来，无论按新的还是旧的道德标准、过去还是现在对党员的要求，刘英大姐都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和模范的共产党人。她早就以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疾恶如仇，严于律己等特点闻名，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会立马感觉出来。她参加革命历史悠久，阅历丰富，特别难得的是始终头脑清醒，记忆力强。直到逝世前几天，我们去探视时，她还谈笑风生，讲起多年前的往事。可惜从此，我们也不能向这位被称为一段党史的活材料、活字典的革命老人请教了。

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刘英同志，是从长征到延安这段历史时期了解党中央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中央内部情况硕果仅存的见证人。遵义会议后，她代替邓小平出任中央队秘书长，负责政治局和常委的日常事务和生活，进行通知联系、作会议记录。中央到达陕北后，她又同总书记张闻天结婚，政治局和常委的会总在人家开。当时尚无严格规定，所以几乎每次会她都在场，有时还代表少共中央局列席，

正式签名在会议记录上。另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找张闻天研究问题，或各地干部来向总书记汇报工作，她也不用回避。例如，一次毛泽东来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也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就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所以，遵义会议后到延安这三四年，她对中央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可以说，在 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后，了解中央这段情况的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因为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就离队去上海和苏联，直到 1937 年底才同王明、康生一起回来。杨尚昆、邓小平等当时既非中央领导，又一直在部队。因此，刘英的逝世，标志着熟悉那段中央情况的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我为向张闻天报恩和补过，也学他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所以从 1998 年离休后，就放弃了从事过 50 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学中共党史，写点有关张闻天的情况以及延安整风等学习笔记。我无法查档，也看不到多少材料，只能靠一些能买到的公开书籍。但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访问刘英大姐这位活字典。先是商定每周访谈两次，每次两小时。这样进行了几个月，因我心梗住院而中断。由于张闻天死于心脏病，所以她谈虎色变，我出院后就不让继续这一工作了。于是，我的探视和采访不得不大为减少，改为几个星期或一两个月去一趟。她也来我们家。去年 10 月 14 日还为“躲寿”来住了一天（并商定今年再来）。诨料这竟是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 20 多年的接触，不但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师生友谊，也使我更认识了刘英大姐，更佩服她那一身正气和高尚人格。我也深深感激她对我的

关心和信任,经常告诫我注意身体,特别是做到无话不谈。有时她会说:“这件事闻天在世时我都没跟他说过,怕他一不注意给说出去。”同时,从她的谈话中,也可感受到一位老党员对党的热爱和对领袖们的深厚感情。她虽然长期蒙冤受屈,但从多次谈及中央领导特别是毛主席时,可以听得出她毫无个人恩怨,讲得客观、冷静,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还保持着当年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品德和为人,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也有清醒的认识。她的记忆力也令人吃惊,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事讲得如在眼前。几次对长征中会理会议前后情况所讲,完全记下来就是一篇生动的文章。如说张闻天总书记怎样让她骑马去请彭德怀、林彪等人搬离草棚来会理住进房子,她走到棚外就听到里面七嘴八舌,大发牢骚。她没敢贸然进去,蹑手蹑脚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只听林彪说,彭老总,我看这前敌总指挥还得你来。以及她进去的对话、会后的情况、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误会,都讲得有声有色,即使这些人自己恐怕也很难记得那么清楚。谈到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她可以说出许多具体事例和一大串人名,讲得具体、生动。可惜有些人和事,特别是人名,我听了几遍也没记下来。又如在东北和外交部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许多人,谈起来她都能说出名字,我却很少记得。一次问她为什么记忆力那么好,她认为这是由于受过两次密码训练和长期做干部工作的缘故。不过总还要谦虚地说,她记的都是具体的人和事,大问题想的不多。就是这样一部早期党史的活字典现在丧失了,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怎能不让人感到哀痛和惋惜。

刘英和张闻天

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他们两人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无法分开的。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

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她婚后,毛主席等领导人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为“娘娘”。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的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甚至“风光一时”。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两个人不畏艰苦,并肩战斗,作出了剿匪、土改和建设都名列当时全国前列的成绩。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也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中央领导或下级干部接触交谈中,也还是自然大方,毫不在意。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她多次和我谈到,对少数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一生享受,不工作的人,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利用夫妻关系走后门、图方便。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

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们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70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近20年,张闻天的著作出版不少,但稿费她不但自己在世时没要,而且也不留给家人,生前和身后全部捐给了有关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她还一再给我们打招呼,宣传张闻天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应任意拔高,更不要宣传她。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寒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请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严以律己 疾恶如仇

刘英大姐长期作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



刘英

属要求特别严格。这方面我的所见极多,这里只能列举数例。初来外交部工作,按周总理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16年,“文革”后,江苏省领导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按老人身边可有一个子女的规定,将虹生调到南大当图书馆馆员。后来刘英回到北京住,邓力群曾找我商量,想把虹生调来北京。结果一问刘英,她坚决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从小的同学)混到一起,出了事她可管不了。不仅不让来京,她还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对虹生注意管教,不要让他搞出差采购等事。虹生现在还是南大的退休馆员。她和张闻天的存款,在闻天去世时就已交了党费。移居北京后又时有募捐,她总是慷慨解囊。1980年前后,王震发起成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要她和帅孟奇等老大姐带头,她当即将所有工资捐出。结果弄得经济上一时捉襟见肘,她的保姆就找我告状,说大姐不让她买鱼肉和贵点的菜,这样下去会影响身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她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她1999年1月18日交给我的一批有关张闻天和她的材料中,有她在1990年4月21日预立

的遗嘱,其中就提到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内容。刘英大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朝天去”,不会有人论短长。她保持了一世的清白。

但她并不独善其身,一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甚至还有点好打不平。她晚年中在纪委工作,主持公道、敢于碰硬,一些案件到她手里总是一抓到底,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一个时期,人们对有的高干子弟意见很大,刘英经过调查了解,就约帅孟奇、章蕴求见胡耀邦总书记反映情况。胡耀邦说,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见一见几位老大姐,并耐心地听她们讲了两小时,最后表示,他知道的比她们讲的还多,但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处,只能慢慢来。在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可以感受得出她的义愤和无奈。后来她从中纪委的岗位上离休,但不知怎么把她传成了“清官”,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失散了的老红军(如那位著名的妇女团长),还是找她告状和解决问题。她经常收到各种书面材料,仔细阅后都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并且不厌其烦地催问结果。过了一阵,领导上找她谈话,要她注意身体,少操点心,以免影响健康。又不久,她的关系也转到了中办。她在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时说,什么注意身体,还不是让我少管闲事,少给他们添麻烦。从此,她也确实尽量不管“闲事”,有告状材料只是照转,不再催问,慢慢地也没多少人找她了。但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党风。谈起某些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也多是苦笑而已。

坚强的意志 超常的党性

在刘英大姐病危时,江泽民总书记前去探视,对家属说,“刘英同志的党性很强。”确实,刘英的坚强是早就出名的。连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她也感到吃惊,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她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就同张闻天开始了恋爱,但不管人们怎么劝说,她就是坚持长征途中不结婚,而且说到做到,直到中央在陕北落脚。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更表现了刘英大姐的坚强。经过全国外事工作会

议和外交部全体党员会议先后一两个月的残酷斗争,她决不乱说,也并未低头。她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说张闻天在庐山参加反党军事俱乐部她丝毫不知,还否认张闻天里通外国。当外交部党委拿出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决定逼她签字时,她写了“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八个字。同时给毛主席写信上诉,托杨尚昆转达。毛看后作了如下批示:“刘英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区别,请你们办理研究,适当处理。毛泽东(一九六〇年)三月廿日”。陈毅在他的名字上方写道:“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需要向外交部干部解释此事,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周恩来在他名下写的是:“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同意与张闻天处理有区别。”就这样,她得到个严重右倾和严重警告的处分。她也知道毛主席有了批示,但问部领导,都说不知道。直到“文革”后甄别平反,还要给她留个尾巴,说运动中态度不好。她拒不接受,去找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她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二天领导就派人向她宣布,属于错案,一风吹了。

相形之下,我就没有经得起那次考验。当时我虽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但跟张闻天十多年,又作了他部分政治秘书的工作,所以,自知在劫难逃。只是出于个人崇拜的思想和自己过关(最怕开除党籍)的私心,没能顶住压力,还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酿成了生平一次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我固然受到比刘英重得多的处理(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但一直感到对不起恩师和师母。所以“文革”后我得知刘英大姐回到北京,就赶快给她去信,检讨错误,要求会见。她也立即回信,约我相会。见面后,对我的检讨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叫揭发批判谁能不听”,反而谈到我受连累、影响前程的话(在会见原驻苏使馆干部时她也为大家受到连累而抱歉)。这真令我无地自容,也体现了刘英同志的博大胸怀。几十年来,我总感欠张闻天和刘英的债要还。这就是我上面说

的改行、补过的原因。

刘英不但意志性格坚强，她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更强。她参加革命后确实做到了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安排。在多年的相处中，走南闯北，我从未见到她对调动工作提过意见。只要组织决定，总是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但对提职提级，她却有意愿就提。例如1958年中组部建议提她为副部长。帅孟奇和安子文都说，刘英无论按资历按工作都应提，在那些还在工作的大姐特别是当年留苏的大姐中，就剩下她一个人没提了。在办完手续报请国务院任命时，周总理曾专门去他们家作解释，说刘英早就该提副部长，但张闻天任常务，她就不好对外，因此建议：或提升后只对内不对外，或党组设常委。可刘英都拒绝了，说总理早已批准她享受副部长待遇，何必再另搞一套。同样，她的行政级别也是定后再未动过。

说刘英组织性纪律性超常地强，就是说她对党的决定和组织意见可以做到绝对服从，思想不通也服从。这里只讲近年的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全党讲了近50年，作为妻子的她能不了解？去苏联时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时也介绍说，这是我党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而且1979年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刘英自己写的悼念文章中也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等。可是过了不到三年，由于陈云的一份材料和一封信，这总书记就一下变成了“负总责”。我又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就多次同她谈这个问题。她每次都可用大量事实证明，不但闻天，就是博古都是总书记。但有关领导要她尊重陈云同志，顾全大局，和党保持一致。于是她就跟着用起“负总责”来了。她不只一次说过，“只要人们知道闻天是个好人，我就满足了。至于当过什么，何必去争呢？”还有个例子。中央到陕北释放刘志丹等错捕的同志，明明是张闻天在他们关押地瓦窑堡领导处理的，但后来许多党史著作和回忆录都写成是远在直罗镇指挥打仗的毛主席下令释放的（也有例外，如《周恩来传》和郭洪涛的回忆等），有的还具体说成“刀下留人”。对此我也作了点调查研

究，访问了郭洪涛等人（郭说“刀下留人”和活埋刘志丹等的坑已挖好是两项最大的捏造）。当然也多次同刘英谈到这一话题。一次我问道，为什么闻天同志派遣处理刘志丹案的一位负责人，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还写上毛主席多年后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就是他先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问题不答自明。刘英当时在瓦窑堡，一切情况她都清楚，但基于超常的组织纪律性，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她也要尽量和主流说法保持一致，写成毛主席和闻天一同处理了。

经过80年的修养和锻炼，刘英同志这种坚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一直保持到她的人生终点。在她病危时，医生就是否动手术征求她的意见，她的回答很简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说完后没几天，她就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信任永远地走了。

爱护干部 严格要求

刘英同志是一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谈刘



何方夫妇同刘英（中）在张闻天像前合影

英,不能不提到她这方面的工作。但这又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用几句简单的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坚持原则,处事公道,爱护干部,严格要求。也许,反右派时对某些干部的处理,可多少说明点问题。

1957年春,我随张闻天、刘英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夏天,国内就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可能是刘英受张闻天的影响,或者是二人所见相同,都对政治运动特别是整人不大积极,所以虽然关心国内的事态发展,却并不急于回国。到了七月份,周总理连发三次电报,催他们回部主持运动。张闻天也一再回电请示,说驻缅甸使馆问题较大,尽快检查完就立刻回国。等他们一回到外交部,运动已热火朝天,有些人正被批斗或已定右派。他们一个党组书记,一个管干部,都是身在其位,不能不迅速投入并主持运动。但在这过程中也表现出他们爱护干部、爱护知识分子的一片真心。例如小有名气的作家俞林,当时在美澳司当专员,鸣放时帮西欧司一专员编了一首顺口溜的大字报批评干部政策,道是:“游击队长姚登山,离开芬兰到锡兰。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结果两人都被划成右派。我陪他们晚饭后散步时,听到刘英议论就有些不以为然,说这主要是文人喜欢“调皮”,又不懂外交工作不能老在一个国家。意思是谈不上反党,划右派有些可惜。但木已成舟,不好再改。又如办公厅一秘书给刘英造了一些谣,支部坚决要划右派,不想在党组会上汇报,正是刘英表示不同意。她听后竟然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结果就没划。

还有一件事,一直被某些人一直误传至今,但却正好证明刘英和张闻天保护干部和爱惜人才的良苦用心。当时有位党组成员和一位司长,听了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异常兴奋,逢人便说,希望中国从此迅速走向文明。加之有几个人常来他们家里议论,还提出过作为一种考虑,是否也可以实行“两党制”,相互监督,避免中国历史上那种兴衰轮替。不想风雨突变,等刘英、张闻天回部,参加过议论的人已被纷纷批斗和打成右派。可那两位较高的干部应如何处理?却颇费脑筋。下面一些人不断催,要求早处理,似乎否则就不足以平“民愤”,特别是那位司长的

副手及其一个老同学,催的更紧,有时还通过我反映。张闻天总说不要忙,要多做了解,全面考察。刘英则主张冷处理,说干脆等陈老总来后再作研究。就这样,拖了半年多,高潮已过。1958年2月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在三、四月间主持召开了四次会处理这一问题。张闻天发言,指出他们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而且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就显著,工作能力也较强,今后还可为党工作。陈毅的结论,只是把问题提得很高,如说他们家简直就是裴多菲俱乐部,是外交部右派的头子,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张闻天的意见,给一较轻处分。这种处理不但得到领导的批准同意,也取得部内上下的多数理解。刘英冷处理的主张,既渡过了群众运动的热潮,也真挽救了有才华的干部。

总之,张闻天和刘英,在反右派中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而且发表过右派或右倾言论的都是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秀才”,比较有能力,戴了帽子,不但会送掉他们的前途,党和政府也不好再用他们。虽然张闻天刘英回来迟了一步,但由于他们抓得紧,外交部划的右派才30余人,占内外干部百分之一左右,在中直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属于比重最小的一个。而且在处理上,刘英不同意把右派下放边疆劳动,人不要了。她说在附近农场劳动一个时期还可调回用。张闻天更提出,“体力劳动能改造人,脑力劳动就不能?而且这些人也多是有些特长的,如外文好。”于是多数也就很快调回了研究所等单位。所以1959年批斗会上,包庇右派就成为他们两人在外交部的一大罪行。他们也承认有点爱才。奇怪的是,“文革”后甄别平反时,又被有关单位说成外交部的右派都是他们给划的,把错划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此,刘英虽有点不平,但也不大在意,反劝我说计较这些干什么。

刘英大姐,细心培养干部、严格要求干部、真诚爱护干部、设法挽救干部,事迹太多,无法细述。而且时间仓促,篇幅有限,只可到此为止。

刘英大姐的精神永垂不朽!

(2002年9月4日)

(作者为《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

(责任编辑 致中)

萧克临危受命：四次城市保卫战

● 陈 靖

1995年3月，我和炮兵老战友高存信夫妇及罗雯相约，一道去北京大乘巷5号看望萧克夫妇。那是个北京难得遇上的初春天气。88岁的萧老和80岁的蹇先佛同志，身体都很健爽，十分热情和我们攀谈了三个来小时。往事今情，感想万千！

萧老为我那册重新出版的《吼声》诗歌集题写书名时，他两次停笔思索，情深意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陈靖同志是唯一在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文艺团体工作过的老战士！”萧克对这句话别有感慨地对我说：“长征一路上，宣传文化工作十分受广大红军指战员欢迎，记得大家对你们有两句评论，我至今还记得：‘一双铁脚板，吹弹拉唱喊！’这种声音给人的印象太深了！”萧老边说边拿起笔来：“不题书名了吧，还是写两句话。”于是，萧老挥毫写了下面18个字：

“是在当时最危险的时候，发出最坚定的声音。”

迟到的罗雯，她是先佛的老乡，又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一进门就提议：趁天气好，三个老红军和我们三个“三八式”一起到院子里拍张集体照。大家响应。六个老战士，都在回味那“最危险的时候”和“最坚定的声音”。长征胜利，抗战八年，黄河东渡，挺进敌后，好不容易将一个称霸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在地。正当被我包围八年的北平、天津、保定、承德、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大同、太原及石家庄等城市的日本人，准备向我晋察冀缴械投降时，远在四川、云南的蒋介石站在峨嵋山上大吼一声：不许动！于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具体策划之下，仅在短短的20多天，把国民党的主力军从西南运到了华北和东北各个重要城市。美军也随之占领了几乎华北所有

重要港口和战略要冲。渤海湾沿岸的塘沽、大沽、秦皇岛和葫芦岛等重要港口，都被美蒋军所夺走。至9月上旬，除了热省会承德，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外，晋察冀热辽的重大城市，几乎全落入蒋美军的手里。

保卫承德

1945年9月9日，一架美国运输机从延安起飞，越过了黄河、吕梁山到了恒山与燕山交汇的北狱区上空，徘徊犹疑，东去西回，终于降落在河北省涞源县的新修土跑道上。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聂荣臻和萧克，再是刘澜涛、罗瑞卿以及蹇先佛等人。这都是一年前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代表。

在涞源这夜，我和蔡铁根、周游等人去看萧克。他十分关心冀热辽方面情况。详细询问了学习与执行毛主席8月8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情况，朱总司令的8月10日、11日的第一号与第二号“大反攻”命令，特别是11日这一天中连续发布的七道命令，部队是如何执行的。周游当时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调到司令部担任军事记者，了解的情况不少，很具体。他又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谈的情况特别使萧克满意。我和蔡铁根近两年虽在党校进行整风审干，了解的情况也不少，因为全区县、团以上的主要领导，均在党校学习过，我们之间联系比较广泛。第二天，聂、萧、刘、罗等领导，便乘汽车赴张家口。我们也弄到一辆卡车，紧随其后，当日到达了张家口。

张家口，这座雄踞于外长城要隘的战略重镇，它原是察哈尔省会，抗战期间，又成为伪蒙疆



萧克

政府的首府，还是日本军反共防苏三道防线的中心屯聚地，故屯集的军事物资非常多。1945年8月被我晋察冀军区十二分区和一分区所解放。张家口还是一座历史名城，至少从辽、金、宋、元、明、清与民国以来，都是军家必争之地。古人有诗赞曰：“勒石燕然是总非，何以杯酒解军威。”当时，党中央机关曾有这样考虑，由延安迁到张家口。

聂、萧、刘、罗进入张家口的第二天，按照在延安的预定方针，立即宣布原晋察冀中央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罗瑞卿、黄敬、赵振声六人为中央局常委。这时，形势非常紧张，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军队还在张家口的西大门捣乱。萧克和罗瑞卿根据中央局的决定，赶赴西线指挥部队作战。

与此同时，东线更加紧张，蒋美大军已抢占了北宁线上几个战略要点。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立即组织冀热辽军区，任命萧克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罗瑞卿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萧克这时由西线赶回张家口，准备赶赴热河、冀东方向，担负起保卫承德的战略使命。

萧克要了解一下晋察冀军区炮兵团的情况。当时团长高存信去张北同苏联军方接洽关于炮兵的一些事务，政委王英高远在延安尚未到任，参谋长林千在西线指挥作战，任务只好落到我这个政治处主任头上了。我一进门行了个举手礼，萧克就对我说了句诙谐话：“昨天文工团长，今天玩儿起了大炮来了！”没等我说话，又问道：“实力怎么样？到底有多少大炮？炮弹多不多？”我也用装饰语言回答我的老首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团能掌握的大炮，是我军建军18年来空前未有过的，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等方面说，是当前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没有的。萧克瞪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其意思是：“你看这位政治处主任说的可靠吗？”唐永健是个大知识分子，3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学生，还当过校级军官，也当过中学教师，知识相当广博。自抗战之初就搞作战处的工作，是聂荣臻司令得心应手的作战处长。有一种说法：聂司令爱邓拓，武爱唐永健。唐永健在整风审干期间，同我在一个小组，我们也互相了解。他此刻向萧副司令说了这样一句话：“目前，全军只有这样一个炮兵团。因为原来总部的炮兵团，三年前调到延安，成为军委炮校的基础了。”我随着唐处长的解释将炮兵团的情况，向萧副司令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望着墙上的地图喃喃地说：“目前已有四个营，还准备组织第五营和第六营，炮兵的发展大有前途！”这时，后勤的张维和航空站的油江来司令部谈问题。萧克见他们更加高兴。张是大学生，专门搞工程设计，唐县的白求恩陵园和阜平的参议会大礼堂，就是他设计的。油江是航空学校毕业，是个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就专门分管航空站的事务。不久前在涞源搞的一套迎接聂、萧等领导由延安归来，凭着空空双手，没有任何导航器材，使一架美国飞机安全降落在一块新修的土跑道上，就是油江一手搞成功的。萧克和聂荣臻一样，特别喜欢同知识分子聊天。此时此地，完全成了一次自由座谈会，处处充满同志式的气氛。在他们面前，我本是个土包子，可是他们硬说我比他们“洋”，是“笔杆子”，是现代化的“排头兵”，还是吃得开的“老财”，手中握着第一等的“金元宝”。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大老板”或“大款”！大家这些玩笑话其实

是出之有据的,因为当时中央军委和军区领导十分强调“炮兵建设”,一切对炮兵优先。张家口的所有军用仓库,多由炮兵掌管,所有军用品,特别是好马、好鞍以至军靴等等,一说就是聂司令员说了:“通通都由炮兵掌管,其他单位不许乱动!”尤其最近有个新决定:沙城的“青梅煮酒厂”由炮兵接收,还说张恒的“恒大”烟厂也要炮兵来管等等。“烟酒权,全是钱”,所以炮兵成为“众矢之的”。萧克是个直肠子人,他对大家的“讽喻话”认真起来,为炮兵说话,解释道:“同志们,聂司令的指示,我是完全支持的。建设炮兵不容易啊!你们知道,在延安时,贺龙同志把他最心爱的马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很喜欢这匹经过长征而壮志尚存的千里马,但他舍不得骑,又把它送给朱老总。朱总也很喜欢这匹马,他最后决定,将这匹马送给了总部炮兵团。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炮兵团有多少大炮吗?是过去总部炮兵团的四五倍还要多。而一个野战炮连所需的马匹,比两个步兵旅的需要量还要多,大家要多多理解新成长起来的炮兵!尽量多给他们支持和帮助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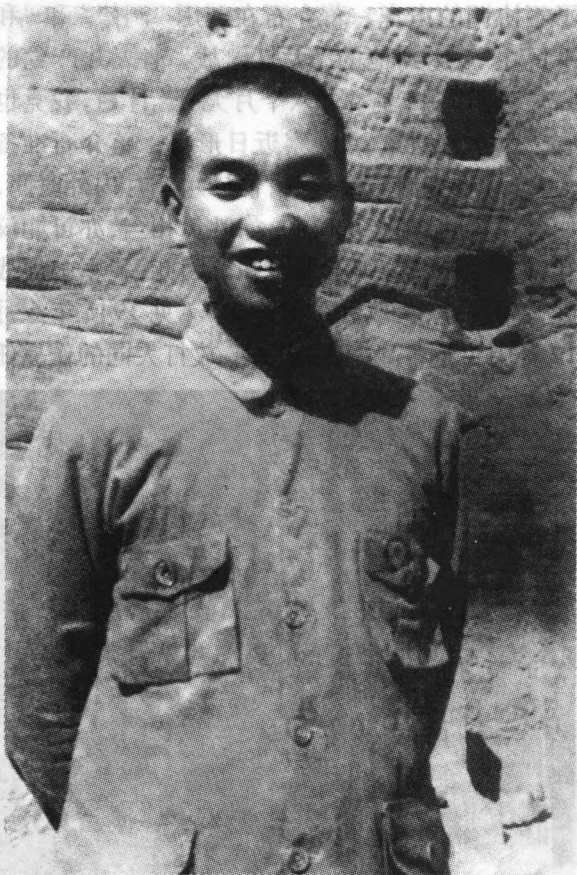
和萧克一起生活过的,都很了解这位性情开朗而厚道的首长,不喜欢别人称赞。当他讲完话离开之后,我们一起借用王昌龄《出塞》诗,改成为这样一首《保卫承德》诗,表示给萧司令送行。全诗是这样的:

古北口系山海关,黄河西渡人又还。
挺进军长神威在,不教蒋美度燕山。

当时,古北口至山海关这片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上,斗争异常紧张尖锐,被称之为“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关键所在。萧克从张家口出发时,美国海军陆战队 18000 人已经在秦皇岛登陆,并很快进占了唐山市。十多天后,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有两个美械装备军(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在塘沽登陆。美蒋一北一南,三天之内在唐山汇为一体。紧接着,国民党又有两个美械装备军(十三军和十六军),先后在秦皇岛登陆。并同美军联手占领了我军所控制的北戴河、留守营及昌黎县城,形势非常尖锐复杂。蒋美意图向山海关、喜峰口至古北口这一线上打开通往东北的进路。其企图是:一是挡住从延安和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我干部和部队,二是尽快同蒋

美军在葫芦岛、营口港登陆的军队汇合,独霸东北。而关键和要害是夺取承德。萧克的使命是守住承德和保住燕山。如何达此目的,萧克胸有成竹。这个胸中的“成竹”是什么呢?一是冀东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相当坚强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这种力量比万里长城还要牢固。二是有两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野战军部队:一支是在过去挺进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冀热辽军区所创的六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另一支是冀热辽本身加上其他解放区调来的六个野战军纵队,其中包括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詹才芳、李中权纵队和黄永胜纵队等。三是在“老冀东”20 余县根基上发展成长起来的广大群众组织,包括开滦矿区的工农,即农、工、青、妇的群众团体,这是海洋般的人民斗争力量。

蒋介石依仗着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他握有的现代化装备和十分充足的后援力量,曾从四方面,即西面的古北口,东面的锦州和平泉,南面的喜峰口,北面的赤峰,向承德进攻。开始妄图半个月拿下承德,后改为一个月、二个月和三个月。结



红军时期任红八军军长时的萧克

果全部变为梦想。至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订和“三人小组”进入长城一线,承德仍然是萧克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李运昌热河省政府的办公所在地,蒋介石妄图切断延安和各解放区通往东北的计划破产了。萧克执行的“保卫承德”使命宣告完成。后来有人回眸这段历史,感慨不尽地说:“如果没有保卫承德的胜利,哪里会有后来的东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这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

1946年2月,萧克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由承德乘美国飞机直飞北平,参加调处执行部会商热察两省的调处谈判。

保卫张家口

1946年的四、五、六三个月,塞外呈现一片春风吹得游人醉的风光。“马周张三人小组”的调停指挥棒在中华大地上不停地挥动,整个中国,以至世界,都在倾听与欣赏这部当代和平民主交响曲的创作与演出呀!然而,这期间却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蒋介石在利用“调停”和“和平民主”,达到他的“大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一整套阴谋中,有个“六个月大打”计划。我党也有个六个月对策:“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可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见1946年6月19日中央致各战略区电示)。攻打大同的作战任



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〇师副师长的萧克

务,正是在此刻,由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战略区共同提出的,共同进行的。但由于多种原因,这次作战是不成功的,大同久攻不下,当我们撤回张家口那天,已见到了东线告急和“保卫张家口”的号召,并组织东线“前指”,由萧克、罗瑞卿任司令员和政委。人们寄希望于东线,打个好仗,稳住张家口。

那是一个形势极端严重时刻。蒋介石得意至极,决心打一场全面内战。共产党和全国爱国人士以及四亿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已经完全落空。党中央已向全国发出表态回声:“既然蒋介石坚决不愿和平,那么就让他选择战争吧!”

9月底,张家口的东大门受到重大威胁,敌人用两个美械装备的主力军(十六军和五十三军),一个炮兵团和强大的飞机群,向我怀来方向进攻。至10月13日,每天敌机出动以百架次计,炮弹以数千发计,向我怀来阵地上猛轰。然而敌人总是摸不清我军的中心防御何在,于是白天出击,夜间退回,不敢贸然前。其实,萧克已经摸清了敌人的用心,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着“妙棋”。他要走在傅作义前面,从东面先进入张家口。于是,蒋介石指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出马,全力以赴,总动员保证夺取张家口的成功。并要陈亲自到南口、居庸关一带作实地调查,亲自布署。以正面出击为佯攻,即从八达岭、康庄方向摆开阵式,反复轰炸和猛烈炮击,造成共军全力于怀来的正面防御。然后从马跑泉方向侧面突袭,一举从镇边城、横岭一线直出怀来侧后,一举夺取新保安、下花园等平绥铁路的沿线重镇,而

拿下宣化,进入张家口。当时,在北平调处执行部的国民党人和美国人,也都相信蒋介石要从八达岭方向攻下张家口。殊不知萧克已将主力纵队悄悄进入到敌人的主攻方向的镇边城、马跑泉一带隐蔽起来了。此地位于南口、居庸关西侧三四十公里,六七年前,萧克就对这一带进行过调查研究。1939年至1942年这几年间,萧克一直注意这片“昌宛”土地上的山川草木变化。今天重踏这片故土,处处感到亲切。他对杨得志、苏振华交待说:这一带是平西根据地的北沿,群众条件很好,要充分依靠群众,把保密工作做到家。这里地形特点和太行山或古北口都不一样,地貌突出,凹凸不一,十分便于隐

蔽，不论空中还是地面，很难发现。一旦进入伏击圈，很难跳出去。一定要造成绝对突然性，让美械化装备施展不开，完全丧失机动性，变成劣势，只能挨打，难以还手。然后采取圈羊办法，收拢包围圈，聚而歼之。再和镇边城与长峪方向的伏击部队密切配合，双管齐下。

10月8日下午，一色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耀武扬威地从南口进马跑泉了。完全按萧克的分析钻进一纵队的



设伏圈，并很快被一纵队 1946年3月，军事三人小组到张家口视察，左起：聂荣臻、周恩来、叶剑英、蔡树藩、贺龙、萧克

切断退路，而敌人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这时，一纵队突然从四面一起合圈上来，气势铺天盖地，敌人完全被动不能还手，总是挣脱不开，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的一个整团和三个炮兵连，共1600多人只好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我埋伏在镇边城、横岭及南石岭的部队，连续两次阻击敌人，把这些凭优良装备打仗的中央军，一个个逼到指定的山沟里，最后也举手投降。这一批也是1600余人。

敌人夺取怀来的美梦结束了。在萧克指挥的平绥路东段，连打三个胜仗，共歼敌6000多，保证了怀来阵地稳立不动。

正当东线战士们，押着数千身穿着美式服装的国民党被俘军人，进入张家口宣化道那天早晨，突然传来使人丧气的消息，傅作义已经侵入我张家口北大门——张北。形势急转直下。平绥路西部的军事形势处于十分不利地位。

胜利的东线，干瞪双眼。主动放弃张家口。

一保石家庄

1947年11月石家庄的解放，使一直被分割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结合为一体，命名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徐

向前、萧克，政治委员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刘澜涛。这座雄踞于华北心脏，交汇着平汉、正大与石德等铁路、公路的战略重镇，像一个巨人横站在冀鲁平原上。这时，不仅华北的领导机关与附属的经济、文化等单位汇集在石家庄周围，而且党中央和军委各机关也由西北迁往石家庄西部不及百公里的地区。然而，石家庄仍然受到国民党傅作义和阎锡山百万大军的严重威胁。

蒋介石曾亲自到北平，妄图共谋“张家口”那样的奇迹，夺取石家庄或毁灭石家庄。唯一的办法是，采用突然加快速的手段，奔袭石家庄。1948年的春夏时节，傅作义本着蒋介石的意图，以他们手中的绝对优势加机械化条件，曾两次奔袭石家庄。巧合的是，这两次对手都是萧克。

第一次是1948年4月底的一天，从北平送来可靠情报，傅作义乘华北野战军进行晋中战役和察绥战役之际，石家庄空虚，他把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偷运到保定隐蔽起来，然后分乘汽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用快速加突然的闪电战术，夺取石家庄，进而捣毁共产党中央机关。为此，阎锡山也投入1万多人的敢死队，东出娘子关，直入获鹿城，包围西北坡，情况来得十分突然，也很紧急。当时，我和炮二师师长高存信（我是政治部主任）正在军区接受关于炮兵新编组的命令，并办理接交手续，被“抓差”，参与了保卫石家庄



晚年的萧克

的使命。

当时，石家庄是座军事空城，野战部队几乎全在数百公里之外，直属军区的四个炮兵团，三个分配到三个野战兵团，执行晋中与察南战役任务，只有一个教导团在身边，但也驻在百公里之外的晋县、无极县境内；距石家庄较近的冀中军区步兵旅，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很弱。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多是一些补充团、训练队之类，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野战部队从前线赶来，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到，远水难救近火。当时的石家庄党政军领导——市长柯庆施，市委书记毛铎，警备区司令员曾涌泉以及中央局副书记兼华北军区副政委刘澜涛，信心十足地看着萧克说：“你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又是中央局常委，还是边区的人民武装部长，总揽指挥大权，名正言顺，你就放手去干吧。”

面对傅作义这个对手，萧克是不敢轻敌的。他决定去阜平城南庄见毛主席，听取他的指示和指点。毛泽东从西北来到阜平，还不到20天。萧克去见他，心情有些忐忑不安。但毛主席要萧克同他住在一排房子里，见面与谈话非常随便，完全像摆家常一样。

萧克不回避地答道：“是的。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现在中央又到了这里，这座大城市若丢在我的手里，不好向党交代。”

“不能这么想。”毛主席稍停一下说：“石家庄是我们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如果丢了，再从敌人手里拿回来就是了。”

听了毛泽东这么一说，萧克如释重负。他心里对保卫石家庄更加有信心了。而这个信心，比之承德和张家口更加坚实有力。

萧克回到石家庄，看到全市上上下下按照他原来的布署，正在进行着疏散和搬迁。将重要物资向市外转移。但在这时候，谣言四起，部分群众惊慌不安：

“共产党要撤了。”“傅作义到了滹沱河边了。”“国军就要进城了。”

正在这时，由正定、无极和晋县等地派来的工作队已进入石家庄，展开安定人心，宣传动员工作。有一位妇女干部指着萧克和柯庆施热情洋溢地说：

“老乡们，不要听信谣言，傅作义他永远也到不了滹沱河！你们看，我们军区的萧克副司令员，警备区曾涌泉司令和石家庄市柯庆施市长，不是正同大家在一起吗！”人们一致把眼光投向萧克、曾涌泉和柯庆施，气氛立刻平静下来，随之而呈现的是街头巷尾，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接着是广播喇叭声响起，人们都在倾听着：

“市民同志们，下面通报敌情，请注意收听。国民党傅作义南下的偷袭部队，在唐河北岸被我军顶住了，寸步难前……”

这天黄昏，市政府秘书长李公侠，特意请来他的本家和朋友李和曾。李和曾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原在冀鲁豫工作，现在来到石家庄，准备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天夜里，召开干部大会，由萧克报告“守城动员工作”。他向干部们如实地说：“这次守城，我并没有什么良策。大家知道，我们的先人曾经演过空城计，不管是真是假，诸葛亮成功了。我们今天也要演一出空城计。因为我们目前的确是空城。诸葛亮是谁呢？是石家庄的人民！”动员报告之后，李公侠和陈靖合编了一出《新空城计》唱段，由李和曾唱，记得第一段和第四段是这样的：

我正在石门城头观山景，
忽听得保定城下乱纷纷。
举目朝北来观看，
原来是蒋傅发来的偷袭兵。

你来，来，来，
这里的滹沱河风景美得很，
既没有高墙也没有埋伏兵，
你来，来，来，
欢迎傅将军和蒋先生。

石家庄外，文连生、向仲华的第六纵队兼程南下，于5月8日进入到山西盂县一带，吕梁军区和太岳军区的地方部队也大踏步地跟上，咬住了阎锡山的尾巴，猛烈穿插，将敌分割开来，进行围歼，并取得成功。傅作义得知阎锡山的一个师（四十九师）被歼，师长张翼被活捉。加上自己的部队被阻击，进展缓慢，不能不信心顿失，悄悄缩回北平。

二保石家庄

四个月之后，傅作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组织对石家庄的第二次奔袭。这次奔袭计划十分周密，但傅作义不可能想到，他身边最亲的人将计划送到了石家庄。

1948年入秋，华北野战军立足全局运筹，西线的一兵团（十八兵团）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行动，准备发起太原战役。二兵团（十九兵团）和冀热辽野战军，继续在长城里外调动敌人，配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行动，迎接辽沈战役。三兵团（二十兵团）向绥远西部挺进，和晋绥军区结成一体，命杨成武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李井泉一道“共同经营绥远”。傅作义在此时刻，组织对石家庄的第二次偷袭。他用郑挺锋的第四十九军和新编第四师及特种兵第四旅等为先头，配备爆破汽车500辆，携带大量炸药，用快速闪电战术，企图在石家庄进行一次空前的地面大爆炸行动，震撼全华北以及全中国。为使这次大爆破成功，傅作义还使用了他的王牌三十五军和蒋介石的嫡系即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上阵。平汉铁路上，风云突变，形势紧迫，十分严重。

萧克这时已到“华北军大”办公（任副校

长，校长是叶剑英），住在距石家庄30里外的章城村。他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聂荣臻打来的，传达华北中央局的意思，让萧克再次主持石家庄的保卫使命。萧克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立即赶往石家庄。石家庄仍然是一座空城，但它和它的四周，居住着华北和中央直属的许多机关、学校并存放着大量准备支援全国大反攻的军用器材和军用物资。保卫石家庄的任务是：既要设法避开敌人的破坏，又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既要市内保持秩序井然，又要进行紧张快速的人力和物资的疏散与隐蔽。此外，还要准备万一敌人哪怕是一小股流串到市区，如何进行一网打尽，以及防空降等等的准备。所以，军委和华北军区决定，一面动员20万民兵沿平汉路两侧展开活动，以阻滞敌人快速南进。同时令二兵团兼程南下，在定县南北阻击敌人。军委为“万无一失”，周恩来副主席亲赴前线指挥，“保证石家庄不能进入一个敌人！”

在两次保卫石家庄期间，有人说，这正是石家庄的青少年时代，看似一身稚气，却放射着青春光芒。当时二兵团四纵队的政委胡耀邦，调往徐向前兼政委的一兵团任政治部主任，途经石家庄，他去看望萧克副司令，也被萧“抓差”留了三天，为保卫石家庄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点子。“石家庄虽然一身稚气，但充满着青春活力，处处显示着宝贵的青春气魄”这番话，就是出于胡耀邦之口。他很尊重萧克，说在长征时候，自己才是个营级干部，萧已经是兵团（军团）的主要领导了。胡耀邦是爽朗坦诚的人，他按着萧克的意图，为活跃保卫石家庄的政治工作，增添了一份力量。

萧克、胡耀邦这两个性格与爱好都有所不同的湖南人，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都爱学习，对新鲜事物都很敏感；二是都具有湖南人的那种“牛劲”，吃的是草，挤出的是乳；三是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满身充满一种青春活力。不同点是，一个凡事有自己的看法，有时有点不大合群，偶尔参加娱乐活动，只知道跟着别人鼓掌。一个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有点稚气浓郁，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

当胡耀邦告别石家庄西出娘子关这时刻，唐河两岸传来捷报，傅作义的偷袭快速部队，全线败兴而归。

（责任编辑 致中）

『民主三号』触礁之后

● 周奋

1955年4月16日夜晚,东海长江口外夜雾迷茫,细雨霏霏。“民主三号”颠簸着在雾海中航行。“民主三号”是上海海运局的一艘客轮,吨位3500多吨,上下五层舱,客舱四层。当时载客1300多人,货物3200多件。当日下午4时,离开上海港16铺码头,向宁波港驶去。出了吴淞口,海域起雾了,风力5—6级,中浪;天下着细雨……

“民主三号”在这条航线上是熟门熟道了,轮船依然航行着。至下半夜,小雨转中雨,风力也增大到6—7级,阵风8级,涌浪增大。轮船颠簸得厉害,许多旅客不能入睡。突然,“吭唧”一声巨响,接着是强烈的震动。当时乘坐该轮的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政治委员李长如同志从梦中惊醒,急向驾驶室走去。这时轮船两舷走廊和舱室中间走廊,站满了走出住舱的旅客,他们满脸疑虑,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恐不安,议论纷纷;也有去抢救救生衣的。李长如到驾驶室,见船长和船政委正忙着组织堵漏,情绪紧张。李当即向船长和船政委自我介绍:“我是华东海军六舰队政治委员李长如,你们船出了什么事?”船政委说:“我们船触礁了!船底舱撞到礁石上,撞开了1米多宽、2米多长的一条大破口,船员拿几十条棉被堵漏都没有堵住,现在解放军和船员还在继续堵漏。”他和船长商量了一下,又说“我们请李政委指挥帮助抢救!”

原来,“民主三号”轮航行时,已偏离了正常航线10多海里了,4月17日凌晨3时03分,“民主三号”轮撞上了太平山甘屿附近的暗礁。这里离镇海口还有20多海里。

听完船政委的介绍之后,李说:“你们千万不能惊慌!现在我们解放军和你们一起抢险,维持秩序,保证旅客安全!你们应考虑万一堵漏不成,应把下层舱门钉死,阻挡海水进入上层舱室,至少可以缓慢进水!同时马上动员全体职工,要大家坚守岗位,维持秩序,安定旅客情绪!绝对不许任何人乘救生艇下海逃生!如果你们船万一开不到宁波,可否选一浅滩搁浅,这样比沉没在深海损失要减少。”

轮船干部得知李是海军六舰队政委,在乘客中数李职务高,对李的建议很重视。船政委马上召开党支部

会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把李的建议作了部署。同时,轮船广播室立即反复播出:

“海军六舰队李政委命令:

请大家不要惊慌!保持秩序,保持船体稳定,我们全体船员,一定坚守岗位,绝对不许任何人乘救生艇,擅自下海逃生!”

“你们发出遇险呼救信号没有?”李长如同志又问道。

“发出了。”

“方位呢?”

“也报了。”

当时搭乘“民主三号”客轮的解放军干部、战士约有300多人,其中有陆军第二十军的干部、战士150人左右,海军舟山基地和第六舰队以及其他海军部队的干部、战士也有150多人。李长如同志从驾驶室出来,马上来到上层甲板,把这300多名不知姓名、年龄、职务的陆、海军干部、战士组织起来,维护秩序和保护旅客安全。轮船出事之后,许多干部、战士就已自发地主动帮助旅客提行李、背小孩、扶老人从下层舱到上层甲板。面对站满上层甲板的惊慌不安的旅客,李长如同志很快意识到,万一发生混乱,其中的老人、妇女、儿童,就会被挤掉海里,感到责

任重大。他马上拿过话筒,首先说明自己身份,对解放军的干部、战士说:“战友们!现在‘民主三号’遇难,我们解放军同志有责任做好抢险工作!维持秩序,保护旅客安全!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军人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以舍身救人的精神,保护全体旅客的安全,维护好秩序,不让任何人下海,不让一个旅客落水。为了保护好老人、儿童、妇女的安全,防止风浪把他们卷进海里,我要求在场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都站到两舷的栏杆边上去!”李长如同志这样一讲,解放军的同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站到甲板的两舷,形成了一道人墙,把群众围在甲板的中间。

轮船的广播室又重复播出:“李政委命令:解放军的同志站到船甲板的两舷,形成人墙,保护群众!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

随后,李长如同志转向群众进行动员。他说:“旅客同志们,我们船触礁了。现在船员和解放军正在奋力抢

险堵漏。我们船还能航行,正在往岸边靠近。我要求大家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任何人不能下海逃生,有几百名解放军指战员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因此,大家要听指挥,自觉维护秩序。年青力壮的同志要照顾好老人、儿童、妇女。同时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海军和宁波港已接到‘民主三号’遇险信号了,很快就会有军舰和船只开来营救我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旅客们看到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不顾自身安危,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大家说:有解放军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放心多了。

大约凌晨三时半左右,底舱的水已进满了,但船仍保持一定的动力,缓慢地向岸边航行。阵阵海浪已打到上层甲板,人们的衣服已湿透了。天很黑,雨停了,但大雾依然弥漫着海面。此时有人报告,在我们船的右前方,隐隐约约有两个亮点。李长如同志判断,这两个亮点,可能是渔船。于是,他请船长放下一艘救生艇,派了七八名海军干部乘艇去查明情况,并交待如是渔船,即说明情况,请他们来营救我们;结果是两艘打鱼的机帆船,并把他们动员来了。大家见到机帆船,十分高兴,而李长如同志却又产生了一种担心,轮船正在慢慢下沉,两艘机帆船不可能把1300多名旅客都载走,在这生死紧要关头,众多旅客能否听从指挥,会不会有人抢先逃生而引起混乱呢?他和轮船干部商量了一下。

于是,轮船的广播又响了:
“李政委命令:先让老人、儿童、妇女乘帆船返宁波港!请大家维护好秩序,帮助搀扶老人、儿童、妇女上船!”

真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在此生死关头,众多的人们听从指挥,不仅没有抢先离船,而且扶老携幼井然有序地上了机帆船。

……

人们见到一位解放军干部帮助一名妇女拎着一个箩筐,箩筐里睡着一对孪生子,这位干部把这位妇女和一对双胞胎送上了机帆船;这位妇女流下了热泪,对着箩筐里的孩子说:“宝贝啊!解放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你们长大了千万别忘了解放军叔叔

呀!”另一位解放军干部搀扶着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上了机帆船,老太太泪流满面,紧紧握着这位干部的双手,一再感谢。可这位干部却因肩上背着东西、双手扶着老太太和她的孙女,下船时把腿碰伤了,鲜血顺着他的腿往下流,但他没叫一声苦。

就这样,数十名解放军官兵和旅客,迅速地将400多名老人、儿童、妇女扶上了机帆船。当两艘机帆船开走后,大家的心情也轻松多了。

两艘机帆船开走不久,“民主三号”客轮的下面三层舱都已进满了海水,船首上翘,船很不平稳。这时,天已放亮,大雾也退了,但涌浪仍然如狼似虎地怒吼着。正在这时,客轮终于在一个浅滩上搁浅了。船也平稳了。但海水已经漫到甲板上,人们半截身子都浸泡在海水里。“民主三号”客轮沉没了,上层甲板露出海面不到1米。

大约在五时左右,从舟山方向开来了七八艘舰艇,由第六舰队副司令员冯尚贤同志率领赶来营救;同时宁波军分区也开来几艘船只。旅客们看到这么多舰船前来搭救他们,一时沸腾起来了,大家流着喜悦的泪水相互拥抱,忘记了还身陷海水之中,兴奋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站在李长如同志身旁的一位50多岁的像是大学教授旅客对李微笑着说:“共产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这支人民解放军,在危急的时刻,爱护人民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营救船只有秩序地把“民主三号”上的全部旅客送到营救船上,一直送往宁波港。既是旅客又是参加抢救遇险旅客的人民解放军陆、海军干部、战士,在旅客全部撤离客轮之后,才随营救舰船撤离“民主三号”客轮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民主三号”客轮的船员们,在做好船上的善后工作后,也撤离“民主三号”客轮。

一场惊心动魄、关系生死存亡的抢救“民主三号”遇险旅客的特殊战斗胜利结束了,1300多名男女老幼遇险旅客,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人落海。



李长如(1960年)

亲历民权门恶战

● 杨昭仁

一 从老兵刘杰说起

我不认识刘杰，在解放天津时他是某团一连的战士，机枪射手。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西蒙诺夫访问一三五师》的文章，他读后给我来了封信，要求我帮助他向老部队反映他在解放天津战斗中，曾立过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因衡宝战役追歼敌人，全连轻装，把背包放在老百姓家院落里，战斗结束后，全连的背包全部丢失，刘杰的奖章、奖状放在背包里也随着丢失。他曾多次要求补发，因部队当时分散剿匪，未能办理。1950年，刘杰作为战斗骨干被派到中南军大五分校学习文化，在学习期间，他给指导员张德富写信，要求补办，因当时战斗紧张未办理。

1953年刘杰在军大毕业后，入朝作战，因头部负伤转到后方医院，伤好后由于留下了后遗症转业回乡。50多年来，刘杰一直在找老部队，找连长、指导员，他抱着极大的愿望，希望能找到老部队证明他这段历史。因部队番号更换，他一直没能找到，更没有找到连长、指导员。一名战士他所认识的最高领导就是连长和指导员。

刘杰的问题反映给原部队后，原部队查了军、师、团、连史没有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甚至，刘杰是否参战，还存有怀疑。

平津战役中的民权门之战已经过去50多年了，我当时是军宣传部干事，在打天津前跟随我们部长下到某团，我在二连帮助工作和了解战前的思想动态。所以我对民权门那场血战很清楚，但对刘杰在战斗中的表现却一无所知。是50多

年后的今天，由于刘杰给我的那封信触动了我，引起我对同战壕的战友极大的同情，也使我回忆起那场血战的惨烈。

刘杰所在的一连，是解放天津突破民权门的“尖刀连”，战后所剩下的人也就是20来个。目前健在的也就是三、四个人。我分别用电话和信件询问了当时一连文书邹致成同志，战后一连指导员、刘杰入党介绍人张德富同志，当年的副营长、在打退敌人反扑中给刘杰压子弹的张金会同志。50年过去了，对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很难记得清楚，但他们对刘杰立功获奖印象很深，都证明了刘杰立过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并向我叙述了刘杰在天津民权门战斗中的表现。

二 大战前夜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3日下午，某团一连召开宣誓大会，全连184名战斗员，排列在师长面前，师长将写着“杀开民权门”的红旗交给一连连长张希尧，说：“师党委要求你们迅速突破民权门，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

“坚决完成任务，决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全连战士振臂高呼。

在师宣传队的军乐声中，男女队员给全连184名战斗员佩带上大红花，师长和每一名战士握手。

13日晚九时，师长送一连进入阵地，他握着一连长张希尧的手说：“要沉着、果断，不误时机。”

“首长放心。”

师长嘱咐说：“进入突破口后，要选好进攻

路线,不能盲目地让战士硬冲。”

“是。”

师长目送 184 名战士走入交通壕。

民权门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嘉奖的标准工事,敌人为扫清射界,在民权门外五里之内,烧毁民房、平了坟头,成了一片无起伏的开阔地。从第一道铁丝网到民权门城下,设置障碍物 11 道,护城河宽两丈,水深八尺,护城河后面是密如蛛网的交通壕,星罗棋布的地堡群,地堡群周围埋了 10 万颗地雷,城墙周围竖着钢骨水泥大型碉堡 13 个,暗堡密布城墙,形成密集的交叉火网,射出子弹的密度,据战后统计,每英尺的宽度 13 发子弹穿过。还有敌人纵深炮火,倾泻在民权门外。

这就是一连面前敌人的工事。从冲锋出发地到民权门城墙下 400 米,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死亡。战士们没有去想生与死,只想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用战士的话说:没啥了不起的,大不了躺在雪地上。我不打死敌人,敌人打死我,就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无所畏惧。

1 月 13 日那一夜,我是在前沿隐蔽部里。隐蔽部里没有几个人,连的干部都到排里检查武器、弹药,检查战士的着装,对战士的腰带、鞋带、绑腿都进行细致地检查。

天很冷,交通壕里坐满了战士,他们穿着大衣抱着枪,默默地闭着眼睛。二班长是全连年龄最大的,他坐在隐蔽部的出口,拿着烟袋向外喷着烟。炮弹爆炸的火光不间断地闪进隐蔽部,将他照得一明一暗,他眯着眼睛,茫然地望着交通壕的远处。

隐蔽部顶上的土,被炮弹爆炸震落下来,弥漫着隐蔽部。我移到二班长身边,他问我:“冷不冷?”

“还能坚持。”我问他:“你闭着眼琢磨

啥?”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你过滦河了没有?看见那片灯了吗?”

“看见啦。”

“有啥感觉?是不是酸楚楚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战争嘛!”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入关后,在过滦河浮桥时,我看见了那片灯——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要找寻的人的名字。在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灯笼上的名字。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玉贵,家来人看你来啦。”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看到一位老人拉住一位挎枪的干部,问:“王富生是我孙子,你认识不?”

“老大爷,我不认识。”

老人急切、颤抖地说:“他是机枪连的。”这位干部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抢着问,声音重叠交错,他无法听清。我从每个人的目光中,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在寻找亲人,渴望知道亲人的安危。

我又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举灯笼对一位干部边问边流着泪:“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王庆才是打锦州牺牲了吗?”

“王庆才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才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窥



1949 年 1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总攻天津

视。

“有人说，她爸爸打锦州死啦，是真的吗？”

“大嫂，我不知道。”

她望着那位干部，翕动着嘴唇自语地：“是死……啦”，她的灯笼从手中落在地上，灯笼在燃烧……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呼唤着名字，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东北的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在秋风夏雨中早已荡为平地了。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远远地留在我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记忆里。

那片灯海，那片喊叫声，也留在二班长的心目中。

二班长告诉我：“连部通信员小曹，他爸爸、妈妈就在滦河找到了他，他妈妈流着泪，抚摩着他的脸，问这问那。”他感慨地咳了一声说：“老人嘛！”

战后，我听说小曹在巷战中牺牲了。

三 总攻开始了

总攻前，某团政委李继宗怕我被打掉，把我叫到团指挥所，让我跟着他的警卫员，警卫员不到20岁，比我大两岁。

指挥所的气氛是凝重、紧张的，我看到团长连划了三根火柴没有点着烟。作战参谋拿着电话，询问各营的情况。

六发白色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了，我们炮群向民权门轰击。我趴在隐蔽部外的交通壕里，看到民权门成为火的海洋，烟的海洋。敌人反击的炮弹不间断地落在团指挥所的隐蔽部周围，子弹打在隐蔽部的土顶上。通向各营的电话线被炸断了，电话员背着线拐子跳出交通壕去查线。他没有回来，电话没有通，第二名电话员又跑出去了。

民权门的枪声是连成一气的，炮弹的爆炸声也是不分个的，炮声和枪声混为一体，像狂风暴雨笼罩着民权门。大地在颤抖，卧在战壕里的战士，在颤抖的大地上等待出击的命令。

“尖刀连”一排的任务是架桥，要在护城河上架起一米宽的便桥；二排的任务是要把炸药包、爆破筒送上去，炸毁11道敌人的障碍物，为

一排架桥、三排突击开辟道路。刘杰就是三排的机枪射手。

爆破手要在炮弹的爆炸中，在轻重机枪射击的子弹缝里，把炸药包送上去，人倒下了冲上去，又倒下了再冲上去。就在这顽强的连续中，二排仅用两分钟的时间，炸开了护城河前的11道障碍物，伤亡惨重。

伤亡更为惨重的是架桥的一排。桥体笨重，桥轮在弹坑里颠簸，连长张希尧看两个班没有架上桥，怕延误出击时间，他带领三班冲上去，将桥推到护城河边。连长和三班的同志们接连负伤、阵亡。护城河近在咫尺，没有力量把板桥推下护城河，是突击排的孙国臣、刘杰和没有负伤的江发谷一起，把板桥推下了护城河。

桥架好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板桥上。三排的同志在踏上板桥时，有多少人倒在护城河下，谁也没有统计过。

三分钟占领民权门，二班副班长李和第一个登上城墙，不到20岁的李银根把“杀开民权门”的红旗插在城墙上，他双腿被炸断，红旗倒下了，他拖着被炸断的双腿，把红旗竖起，他又一次负伤，年轻的生命在红旗下结束了。这面红旗至今陈列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敌人要重新夺回民权门阵地，阻止我二梯队跟进，敌人纵深炮火上百发地倾泻在民权门内外，封锁通道，配合正面敌人反扑。

184个人的“尖刀连”，占领民权门后，就剩下20个人了，164个人都倒在民权门的雪地上。

由于二梯队没有及时上来，这20个人能否守住民权门阵地？阵地是用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如果阵地失守，不但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白白付出，再夺取民权门，就不止164人了，要成倍地付出。

邹致成在信上说：刘杰的机枪在打退敌人反扑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次次把敌人反扑打下去。是张春林、江发谷给刘杰压子弹。刘杰连续打坏了三挺机枪。就在这时，少数敌人已冲上阵地，敌人抱住二排长王春田的腰，他同敌人从土坡上滚到交通壕，被七班长杨得礼用爆破筒把敌人打死。在左边碉堡里的杨景友、孙国臣听刘杰的机枪不响了，他们爬过交通壕，把敌人丢下的机枪、子弹送给刘杰，刘杰的机枪又响了，敌人被打下

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我軍攻佔天津

守敵全部被殲

△活捉敵警備司令陳長捷▽

平津前線十五日下午三時急電：人民解放軍今日下午一時半完全佔領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天津，守敵全部被殲滅，匪首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被活捉，市民對於天津的迅速解放，極為歡欣。劉天津的攻勢開始於十四日上午十時，僅經過二十七個半小時就完全解決戰鬥。天津的迅速解放，給北平的傅作義和李文一個鮮明的教訓：如不接受解放軍的要求迅速率部投降，他們就只有等着做俘虜。

天津介紹

天津，位於海河下游，是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是華北最大的港口。天津的迅速解放，是人民解放軍在平津戰役中的重大勝利。天津的迅速解放，是人民解放軍在平津戰役中的重大勝利。天津的迅速解放，是人民解放軍在平津戰役中的重大勝利。

去。

二排长王春田是一连唯一的指挥员，连长、指导员、一排长负了重伤，三排长阵亡。王春田看到七班副李金耀负重伤仍坚持战斗，他命令一个战士把他背进碉堡。李金耀说：“排长，我还能爬，让没有负伤的同志留在阵地上。”王春田感动得几乎流下泪，他感谢李金耀，因为阵地上多一人就是一份抵抗敌人反扑的力量。他看着李金耀吃力地爬进碉堡里。

副营长张金会带着二连、三连上来后，向敌人反击，刘杰随着副营长进入王串场。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进入王串场后，遇到一个营的敌人反扑，机枪射手李和负重伤，机枪被炸坏，在危急时刻，张金会副营长抓住刘杰唯一的一挺机枪，他给压子弹，打退敌人反扑。

张金会同志的证明里写道：……50多年了，刘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他是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

张金会同志在病中，为了给刘杰同志写证明，请医生给他打了针。这么深厚的感情，这对在那场血战时还没有出生的人来说，是体会不到的。

六 刘杰真

昔今碉堡

团指挥所随二梯队进入民权门突破口，我是在卫生员小杜的指挥下，随团指挥所进入突破口的。小杜让我卧倒我就卧倒，让我快跑我就快跑，一定按着他的路线跑，否则就可能踩上地雷。

子弹密集地射在交通壕上，炮弹带着尾音连续爆炸，有几发落在交通壕里，把敌人的尸体肢解抛在空中。

我跟小杜进入敌人交通壕，交通壕里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没有断气的伤兵，踏上去软绵绵的，有的还在叫唤，谁也不顾那喊叫声，照常踏着跑过去。

团指挥所进入被炸毁的敌人碉堡里，碉堡里敌人埋了颗地雷，没有时间起雷，团长命令通信员守着以免踩响。通信员开始是站在地雷旁，由于二梯队的进入，碉堡里人越来越多，通信员蹲在地雷旁，后来他坐在地上，地雷在他两腿之间。

因为进入突破口后就没有交通壕了，从护城河到碉堡是一站，谁都要在碉堡里喘口气，碉堡里过路的人越来越多，通信员急的大骂。不管通信员如何骂，出入的人照常拥挤，因为外面的子弹和炮弹的爆炸太密集了。

2000年我到天津，乘出租汽车来到民权门，寻找那场血战的遗迹。战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了，水深八尺，宽两丈的护城河被宽敞、笔直的柏油马路代替，那个埋着地雷的碉堡不见了，在它的遗址上是座闪着霓虹灯的酒楼，里面传出的声音不再是通信员的骂声，而是架子鼓和男女青年的欢笑声。

我问出租汽车司机：“你知道这里有过一场血战吗？”

他反问：“嘛血战？”

是的，没有人记得那场血战了，那是昨天的事，是往事。昨天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天津市民权门综合批发市场”这条横幅是民权门唯一的标志，里面不再是碉堡，也不再是

敌人的隐蔽部了，而是繁华的商业小街。50年前这里是敌人的隐蔽部，上百条电话线从这里拉出，一连冲进去后，有的敌人被打死，有的被俘，桌子上堆着酒瓶和罐头，留声机还在转，唱片被战士一枪打碎，留声机也停转了。

五 战后评功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王庆坨召开表彰大会，师长把一面写着“钢刀连”的奖旗授给一连，命名一连为“钢刀连”。

民权门之战，伤亡之大，功绩之显著，在一连的连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评功会上，20个幸存者中，有18个人分别立了一大功、两大功、三大功。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六名，在队的有杨景友、刘杰；阵亡的：李银根、钟汝彪；负伤住院的：李和、孙国臣。两个人没有立功，一名是文书邹致成，他因忙于上报材料没有参加评功，另一名是王永润，他冲到民权门后，看到和自己终日生活在一起的战友倒在雪地上一片，他不顾一切地冲入敌群，在他换冲锋枪梭子时，被敌人按倒了，二梯队上来后，敌人逃跑时把他丢下。对王永润是否立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他是孤胆英雄，有的同志认为他被俘不能参加评功。

王永润在邹致成心目中，是孤胆英雄，他在辽西会战时和副排长两个人抓了300名俘虏，他的衣领上被子弹穿了两个弹孔。

王永润没有立功，他背着沉重的被俘包袱，沉默寡言地跟随连队过了长江，在衡宝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张德富是一连战后的指导员，是刘杰入党介绍人，他证明刘杰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我同刘杰无亲无故，同他断绝联系50多年，出于战友的情分，本着对历史、对组织、对个人负责的慎重态度，我写了两份证明，一份寄给老部队政治处，一份通过老首长房扬达转给军里。（房原一营营长后升为副军长离休）

房扬达同志为了解决刘杰的问题，给原在某团工作的老同志分别写了信，同时给某团的老政委李继宗和原师的组织科长鲁挺同志也写了信、通了电话。李继宗在电话中对鲁挺同志说：让我

签字证明，我签字。

为什么刘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在哪里？

因为军、师、团、连史上没有查到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刘杰是否参战，因为军师团连史上也没有他参战的记载，所以尚存怀疑。

一名战士是否参战，任何时代的历史也不可能记载，同战壕的战友证明了，还不被承认，那么，这名战士全身是嘴也无处去说。反过来说，军师团连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有“张冠李戴”的。如，李银根误为姓钟，孙国臣误为姓杨。在连史里记载着，民权门战斗中涌现出了八位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他们是：丛德瑞、张中富、杨青林、杨景友、陈印、李和、杨〔孙〕国臣。（注：缺一）这八名战斗英雄里，且不说有没有刘杰，其中有两名根本没有参加民权门战斗。杨青林在1947年羊山子战斗中就牺牲了，丛德瑞在进关前就离开连队，可是连史里仍然记载他们是民权门的战斗英雄。

这个团的档案材料，在衡宝战役中突围时已经烧毁了，现在的档案材料是后来老同志们追记的。

六 刘杰真人

刘杰不是他的名字，是本地地主儿子的名字，他也不姓刘，他从小给地主看牛，做长工。1946年地主买通了国民党乡公所，把他顶替地主儿子刘杰抓了壮丁。1950年在军校恢复原名——张大吉。他1948年解放入伍，在我们党的教育下，很快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大地主、大恶霸的代表，所以，他在战斗中积极勇敢，沉着顽强。

张大吉同志回乡后，谁也不知道他是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他离开医院携带的档案里，没有一笔他立功的记载。

他年老多病，后遗症随着年龄越来越重。大儿子患病九年病故，为儿子治病欠债累累。女儿又淹死。儿子留下的孩子要他抚养，他生活在贫困线上。

21个月后，在军首长的关怀下，张大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如果军首长不过问此事，张大吉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责任编辑 吴思）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 张登善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这样做很不经济。采用人海战术，用工量超出常规好几倍。质量尤其粗糙，例如10米高的砖墙一天砌到顶是违反国家《规范》的规定的（按规定，砖墙每天只能砌1.2米）。由于灰缝下沉量集中发生，建筑物出现很多裂缝。

这些楼质量差，但还能使用，比它的一些兄弟“卫星”要幸运得多。哈尔滨的农业大厦，一座五层的大楼，竣工后一个晚上，突然崩塌，幸好尚未住人，未造成严重伤亡。这是一座“四不用”大楼，所谓“四不用”，指楼的结构中不用钢材、木材、水泥和红砖。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结晶。

由于我国的财力、物力有限，根本实现不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所以大搞紧缺物资的代用品就成了我们技术人员一项重要工作。缺钢筋，我们找到了竹筋、玻璃纤维代用；缺木材，我们找到了玻璃钢（以树脂粘合玻璃纤维制成）代用；缺水泥、红砖，我们找到了蒸养或非蒸养硅酸盐代用，于是“四不用”的建筑就出现了。农业大厦的垮台也许是件好事，它使“四不用”甚至“八不用”的冒险有所收敛。

除了建筑本身，各项配套工作也在放“卫星”。为了增加运输力，人们在货车后面猛加挂

斗，一辆载重3.5吨的解放牌货车竟加到八个载重量一吨的挂斗。1958年我亲眼见到它行驶，像一列无轨火车。最后因妨碍交通而被迫停止。

不要以为这些事都是群众自发的行为，不是，是各级组织号召的。我还清楚记得德阳工业区区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号召推广超声波的情景。他说：“不就是一截钢管、头上装上一个薄钢片吗？能量就在这个薄钢片上。和小时玩儿竹管上加一片竹叶一个意思。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当天晚上，我单位职工一夜未眠，加工超声波。仓库管理员奉命打开仓库，听凭各取所需，结果一晚上用了十余吨钢管。凡是水阀、汽阀都装上“超声波”，算是实现了“一夜超声化”，也是一颗“卫星”。

这些事例是说不完的。听起来好像笑话，想想却令人心酸。年轻人会奇怪，你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怎么这样不讲科学，好像小孩子过家家，想怎样就怎样？其实，1958年起，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遭到破坏，是由于有一股由上而下的急功近利的狂热思潮，技术人员是不起作用的。

那些不尊重科学的行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以“钢帅”、“粮帅”为首的大小“卫星”不久都销声匿迹，徒然给国家造成损失，成为1960年出现经济困难的前奏。但是，人们并未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70年到1976年，我在第二汽车厂工地工作。亲眼看到在这样一个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违反科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首先是厂址的选择，这个厂分散在24条大山沟里，土石方数量惊人。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材料、产品和后勤物资的长距离运输已经注定了这个厂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但这样做符合林彪“山、散、洞”的要

求。

该厂的主要机器都是欧美进口的，非常先进，但厂房和宿舍完全是“低标准、瓜菜代”。不是艰苦朴素而是不安全，不适用。例如，宿舍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一种板筑三合土）建筑。这种“干打垒”墙收缩非常厉害，居然做到四层楼，而楼梯间却是砖砌的，结果变形不协调，墙体裂缝大到二、三厘米，听说后来“干打垒”都被拆掉，改砖墙了。

“干打垒”非但被用于房屋，还被用于做桥。在十堰市，人们建了一座长约12米的双拱公路桥。因为不放心，施工人员悄悄在土里掺了60吨水泥。其实，有这60吨水泥，建一座混凝土拱桥也够了。尽管如此，土桥建成后下面仍出现了几条裂缝，因为干缩是土的天性，无可奈何的。这几条裂缝真是太好了，它影响了“干打垒”桥的推广。这座桥使用了很长时间，但每通过重车，则须在桥下加支撑。

最危险的事是人们企图做一种“干打垒”双曲拱，用于仓库屋面，跨度有12米和18米两种。天幸在做荷载试验时，拱被吊到4.5米高处，跨下来了。拱上的4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我妻子）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居然无伤亡。

第二汽车厂的厂房设计得过于简陋，薄壁型钢屋架、轻型檩条（由钢筋焊成）、单槽瓦。我觉得这个结构方案很适合做自行车棚。后来轻型檩条发生一次因结构破坏而高空坠落事故，人们就对屋架和檩条进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加固，而且是在载重情况下高空焊接的，场面很动人。单槽瓦不保温，影响生产，又搞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增加保温：屋面满加矿棉保温层和瓦楞铁防水层。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整个二汽建设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些不尊重科学的冒进行为，发生在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的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责任多大，要具体分析。

“大跃进”一开始就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重大问题都由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决定。技术人员是主办者，但领导有否决权和拍板权。在技术人员中，有迎合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以求政治进步者；有坚持科学，据理力争，不怕右倾保守之名者，但那是少数。大多数人坚持科学而不强调，陈己见而不坚持，最后服从领导决定。这和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较软弱有关。

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毛主席历来反对“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一般知识分子却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还时常受到一些无端的辱骂。在二汽工地，北京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经常强调基础要做在老土上（不要做在填土上），一位领导竟在作报告时讥笑他：“有那么一位老土工程师”。中南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行车梁被中南军区的一位首长看见了，嫌它太厚重，说：“这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20年的历史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异于一场噩梦。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自身人格的备受摧残，而且是看到世界各国在科技推动下，生产力突飞猛进，我们却停滞不前。更令人痛心的，从“五四”运动起，先驱们就为民主和科学而奔走呼号，而在近40年后，竟出现了一股“不要迷信科学”、“知识越多越蠢”的反科学潮流，真是令人扼腕长叹！（责任编辑 吴思）



河南信阳市郊五里墩的土高炉群

“天天读”备忘录

● 雷 颐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入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老师进行“大批判”,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地自我批判;再不,就是到工厂和农村“开门办学”,以“经风雨、见世面”。但不论“课程”如何变化,有一门却必须“雷打不动”地每天都有,绝不能变,这就是“天天读”。

所谓“天天读”就是每天早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像作完“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早请示”之后,必须读一个小时的“毛著”。这一小时可是非同小可,因为事关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到这一天的“方向”、“路线”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工农商学兵全国各行各业都必须有一小时“天天读”。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得挤占这一小时,“天天读”必须百分之百地得到保证,做到“雷打不动”。“上面”反复告诫,一定“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

开始大家还有种新鲜感,虽然都才十四五岁,却都尽量“带着问题”认真读,想把自己锻炼成为“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然而久而久之,日复一日,终于发现“六根难净”,无法天天全神贯注地“改造思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天天读”也就一天天松懈下来。但在每班一位工宣队员或军宣队员——此时大多数老师早已“靠边站”,反正又不学文化课——的严密监视之下,所能做的“小动作”就是在纸上写写画画。乍一看,还以为人人都在认认真真地写“学毛著”的心得体会。

但“人生写字祸害始”,这乱写乱画,可给不少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因为按照“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理论,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和“保险缸”里,“阶级敌人”时刻在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何况我们在“文革”前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还受了整整六年“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黑路线”的毒害呢!所以在我们中间必定也会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再说,每天批美帝、苏修、刘少奇毕竟离我们太远,而本校该挨斗的老师在每班“轮流揪斗”了已不止一遍,“文斗”加“武斗”,这些“牛鬼蛇神”早已遍体鳞伤,被“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时反复强调“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个车间、田头、连队、课堂”,决不能留下阶级斗争的“防空洞”。于是,工宣队、军宣队按照“新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在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中间进行“阶级斗争”,使阶级敌人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无处藏身。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了几次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动员会后,经过同学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全校几十个班果然班班都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都找到了两三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甚至“反动倾向”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就是在“天天读”时东倒西歪地东写一句西抄一句,愣是让一些“觉悟高、警惕性高”的人从这毫不相关的字句中抽出几个字来,组成“反标”。也难怪,当时从一幅画的浪花、波纹或麦秆、稻穗中都能琢磨出“反标”来,何况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字”呢。我们班也先后揭出了一男一女两个“有问题”的同学,成为全班“大批判”的对象。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在“天天读”乱写乱画时“暴露”出来的。

首先被揭发出来的是那位男生。

有天“天天读”的时候,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标出许多名胜风景,接着又画出了他想像中的旅游路线,几乎游遍了名山大川。但要命的是,他的旅行



“空真”森活坐县不托助，“才道”天天读”背诵“老三篇”

终点竟是台湾的阿里山！更要命的是，这张废纸被他随便扔掉，却被某位“觉悟高”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悄悄捡起，交给了管理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

这可不得了！工宣队研究后，勒令这位同学开始深刻反省，同时在班里展开动员，发动积极分子统一口径，准备大批判。在工宣队的细心“启发”下，“大批判”的火力“层层深入”，迅速击中“要害”。首先，要批判他“天天读”不读毛主席著作，是“态度问题”，是……第二，他一心想游山玩水，贪图享乐，根本没有当“革命接班人”的伟大理想，没有“解放全人类，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宏伟抱负……第三，他的目的地是台湾，具有明显的反动政治意图……最后，一定要揭出他的阶级本质和阶级根源。

这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刚入校时就“贯彻阶级路线”，对每个同学的家庭出身、父母是否有政治历史或“现行”问题都作了详细清理，分为“红”“灰”“黑”三大类，据此作为奖惩不同、能否加入“红卫兵”的根据。这位男同学的家庭出身属于最“黑”的一类：出生不久父亲就被“镇压”，母亲自杀，从小由舅妈养大，而他的舅妈也是“右派”。所以，他的不学“毛选”、想到台湾等等等等都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是有“阶级根源”的。这些，成为随后两个月的“大批判主题”。在班级举行的一次又一次批判会之后，这位男生开始作“自我批判”。对前几项“错误”，他一开始就“供认不讳”，但就是不承认“阶级本质”这最后一点，所以他的检查总也通不过。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由自己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并表示一定要与自己的阶级划清界线云云才算通过。

按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下葫芦还会浮起瓢”。这位男生刚“通过”不久，那位女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这位女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质彬彬，能唱会画，还会拉小提琴。当时，会拉小提琴的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她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颇引

人注目。……一次“天天读”，她拿钢笔在纸上画了小桥、流水、柳树、丛丛鲜花，一位少女坐在花丛中愉快地拉着小提琴，旁边还写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中十分著名的最后一句：“她在丛中笑”。无疑，这是幅“自画像”。画完也就随手不知是扔在地上还是放在桌上或桌屉里，反正最后也通过某位同学到了工宣队的手里。

同样，又是先召开积极分子会，统一批判口径，布置批判内容。

首先，还是“天天读”不学“毛著”的态度问题。第二，这幅画明显表现出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要联系到她的生活作风方面，比如她爱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和裙子，头上喜欢系别致的“蝴蝶结”……另外早有同学反映她常常不自觉地哼一些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类外国歌曲或“蝴蝶泉边”这类“文革”前的抒情歌曲。当时，这些歌曲都是被明定为“黄色歌曲”而严禁传唱的。第三，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概写下的《卜算子·咏梅》是有深刻寓意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个“她”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化身，面对国际帝修反反华高潮而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百丈冰”，“她”傲然相对，是冰天雪地中的一点红，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她”以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世界革命必将如春天“山花烂漫”般在全球轰轰烈烈，笑待那一天的到来……这些都是人人皆知、早有定论的“标准解释”，但她居然用毛主席的“她”来比喻她自己，表现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情调！虽还不是政治问题，但影响极坏，性质严重。最后，也是找阶级根源。经查，她

的主要社会关系中虽然没有“关、管、押”，也没有“清理对象”，但她毕竟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情调肯定是来自这种家庭的影响，也需要划清界限。

开了几次批判会后，她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一些调皮的男生还给她起了外号：“丛中笑”。到底女生脸皮薄，不久她就随父母下“五七干校”，到农村去了。

平心而论，我们学校工宣队的“政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明确规定“有问题”的学生是“可以教育好的”，与“有问题”的教师有本质不同，要“区别对待”，只在本班批判，不到各班“轮斗”，更不准“武斗”。而有些“先进”学校到我们学校来“传经送宝”，介绍他们的经验，对这种学生也要“稳、准、狠”，要到各班“轮斗”，“问题严重的”甚至要召开全校规模的批判大会。

经过这些风波，同学们虽然依旧写写画画，但都养成了“敬惜字纸”和良好的“环保习惯”，很少乱扔废纸。不是小心放在衣袋里，就是撕得粉碎扔到“字纸篓”里，再未发生“意外事故”。

当然，“大批判”也不能占用“天天读”的时间（对此不详述）。由于当时不学文化课，每天不是军训、政治学习就是学工、学农劳动，所以有的是时间，但每个星期六的“天天读”时间却可以不读毛著，而是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交流会”或“活学活用”“讲用会”，再不就是结合毛著“斗私批修”，人人都要公开批判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有次开“斗私批修”会，大家的发言无非是检讨自己的迟到早退、劳动偷懒、学毛著没有“带着问题学”，男同学打架、女同学搞不团结之类。但我们班的军代表听后极不满意，在严厉批评我们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后，给我们作了“狠斗”的示范，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同学们，这个私字总是藏在灵魂最深处，不用层层剥笋的方法就斗不出来，我给你们斗个样子看看。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仅着这一件衣服穿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仅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

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你们看，迟到几分钟看起来是小事，里面的私心可不小……”后来好多次，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地如法“层层剥笋”、“狠斗私字一闪念”，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种“剥笋法”。

“天天读”我最喜欢读的是某“革命群众组织”编写的《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解释》，这本“解释”和《毛主席语录》一样大小，也是外包红塑料皮的“小红书”。在这本小书中，我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大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读来非常有趣。虽然工宣队、军代表都提醒我要以读原著为主，但一本“小红书”和《毛泽东选集》同时打开，他们也分不清我是在“读原著”还是在读“解释”。总之，我的“成语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那时。

从1968年秋到1970年末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这两年的时间里，不少同学靠“天天读”练了一手好字。同学们最喜欢抄的是“毛主席诗词”的手写体，所以许多人都能写一手的“毛体字”。由于把当时公开发表的37首“毛主席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虽然我们从未学过古文，更未学过古典诗词，但熟能生巧，在我们这些实际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一些学生间却无意中兴起了一股填词、写律诗热。一时间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唱我和，煞有介事。毕业下乡前，从男寝楼搬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拿着毛笔信手在墙上写了一首近似“打油”的“七律”。虽只看了一眼，但至今我还背得出：

爷们将到农村去，
此地空余男寝楼。
爷们一去不复返，
小楼从此空悠悠。

高楼幢幢城中路，
稻菽片片乡间田。
日暮乡关何处是，
瞻望前程使人愁。

虽然格调“极不健康”，有对抗上山下乡这一“防修反修”伟大战略部署之嫌，但下乡插队的工作非常不好做，为保证所有同学全都按时顺利下乡，好实现“一片红”向毛主席“献忠心”，工宣队对此也就一笑了之，并未深究，算这小子幸运。（责任编辑 吴思）

我奉命保护 苏加诺总统的华人助理出境

作者：马尔韦·赛兰 (Maulwi Saelan) 译者：黄元焕

译者按

印尼苏哈托右翼军人政府统治结束后，民选政府成立即开放言论自由，逐步把右翼军人集团对苏加诺的诬蔑推翻。最近出版的较令人瞩目的著作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1965年前后关于印尼局势和美国干预的解密文件，许多右翼军人集团和美国情报局勾结和接受资助的内幕，以及原总统警卫团副团长马尔韦·赛兰上校撰写的回忆录：《从1945年革命到1966年政变》

作者马尔韦·赛兰除曾担任总统府警卫团副总外，还是印尼国家足球队赫赫有名的门将，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因此当此书于2002年5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隆重的发行仪式时，梅加瓦蒂总统和印尼革命元老，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各界人士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忆述了苏加诺总统如何保护他的华人私人助理司徒眉生安全离国以逃离当时右翼军事集团绑架阴谋的经过。这个阴谋的策动旨在达到加速推翻苏加诺总统的目的。他们企图在绑架成功时，对司徒眉生逼打成招，制造假供。他们阴谋诬指九·三〇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在得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联合印尼共产党所发动的，以达到消灭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为目的。因为司徒眉生当时在总统府参与处理关于中国以及新兴力量运动[指第三世界新兴的独立国家]的事务，被认为熟知内情，因此策动了对他绑架后予以清除的阴谋。司徒眉生曾是印尼华人中有不平凡经历的人物，梅加瓦蒂总统至今仍尊称他为叔叔。

当时的局势变化的确是使人感到窒息的。不管他是谁，只要是和苏加诺总统亲近的人，就都会被认定是必须加以逮捕，或必要时必须通过绑架来清除。

例如一向协助苏加诺总统与中国朋友沟通

和会谈的总统私人助理兼华语翻译司徒眉生就立即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好在他在陆军战略司令部[Kostrad—苏哈托时任司令的特种野战部队即发动政变时所利用的主要部队和雅加达军区司令部[Kodam Jaya]的朋友都非常紧迫地把正在酝酿着，将威胁他生命安全的情况通知了他，有一位将军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亲自向总统报告了企图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

因此，当眉生到总统府报告可能降临他身上的危险时，总统当即决定让他暂时出国，以保护他的安全。其余的事，容后视形势发展再作决定。

当司徒眉生正准备从马腰兰机场起程出国时，却为军事掌权者方面发觉。他们派出一位中校衔的军官，阻止他离去。幸而那位军官还允许他们打电话回总统府，报告受阻情况。

在总统府接听电话的，是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雅明，他感到事态严重，便立即把这突发事件向总统作了口头和书面报告。总统随即嘱咐雅明，传令该军官让司徒眉生回总统府，这命令当时还是被执行了。

阻止司徒眉生启程的借口是因为他是华文《首都日报》的社长。这家报纸被控支持“九·三〇”运动，其实这家报社是与大雅加达首都特别区政府合办的。

总统亲自听取了眉生有关出国受阻的报告后，立即就在雅明事先提交的有关他不获准离境事件的备忘录上作出明确的批示，其内容是发出总统给地方战时掌权者和眉生本人的命令，让眉生前往香港。

我当时是总统府警卫团“渣克拉比拉瓦”

团的副团长。总统突然传召我，命令我翌晨要亲自护送司徒眉生到马腰兰机场，送上飞机，让他安全出国。

眉生的离开当然会被认为含有政治意味，我和参谋人员还得想出让他如何通过军方检查的合理理由。因为他当时也兼任印尼共和国总统保健小组秘书。恰好总统私人医生刘英昌博士[Dr. Lauto Ing Tjing]也要到欧洲寻购治疗总统疾病的药品。因此，我们决定让司徒眉生以同样的任务和刘医生同行飞往欧洲。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医疗小组仍在协助治疗总统的疾病，后来获悉，总统的政敌也诬蔑中国医生卷入“九·三〇”运动，因此被请离开印尼。

在雅加达军区司令部有关军官们的配合下，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卫护眉生安全出国的任务。

后来知道他平安抵达荷兰后，再从荷兰续程飞抵香港，但未能得到当时仍在英国统治下的港英政府的居留许可。又再从香港转赴时属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澳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之后的日子里，眉生以他出色的才智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加上真主的庇佑，使他建立的企业在异地成功和发展了。

其实，眉生除了是印尼共和国总统私人助理，主要任务是维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外，并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没有必须让他离开印尼的理由。

苏哈托推翻了苏加诺总统，在时光流逝十多年之后，苏哈托又需要使用司徒眉生了。1981年，苏哈托命令贝尼·穆尔达尼[时任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后升任武装部队上将总司令]到香港和眉生见面，要求他回印尼一行，因为苏哈托总统想和他商谈印中关系的问题。

眉生当即表示如果人身安全受到保障，愿意回印尼一次，因为1965年的创痛仍是记忆犹新。他和他的好友时任印尼副总统阿丹姆·马立克的秘书联系。在副总统向他作出人身安全可以保证的承诺下，司徒眉生终于飞返印尼，总统苏哈托将军第二天晚上就在珍达纳大街官邸会见了她。

由于印尼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入1965年“九·三〇运动”，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仍处于冻结的状态。尽管如此，苏哈托却希望两

国间的直接贸易关系能先行建立。

苏哈托总统要司徒眉生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北京当局，并声明两国外交关系虽仍未解冻，但印尼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苏哈托总统设想能在外交关系恢复之前，先开始建立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事实的发展是在酝酿经年后才有了印尼工商总会[Kadin]，随后与中国贸促会开始进行谈判和交往，谈判地点开始是在新加坡举行的。

苏哈托虽然非常恨共产党，但涉及有利于他的商业关系时，意识形态问题可以搁置一边。

就这样，印尼商品如橡胶、木材、棕榈原油等等，源源流向中国，而中国制造的许多商品也销来印尼。

当眉生第一次重返雅加达时，我见到了他，我们都为能够重逢兴奋不已。我向他出示了一件极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是苏加诺总统当年为保护他出国签署的命令书原件。这封命令书是我出狱后，在残存的档案中偶然发现的。

在苏哈托总统统治时代，司徒眉生虽然人身安全曾经受到威胁，但仍然愿意给印尼提供必要的帮助，譬如他曾协助印尼粮食机构从中国购买当时十分紧缺的大米。

他在印尼国内曾被追捕、甚至被追寻到国外去，令他必须埋名隐姓，以逃脱苏哈托情报人员的追踪，在与香港为邻的澳门悄悄地创建自己的事业。

幸运之神给他的企业带来光明的前景，逐步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由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企业以澳门为基地，商业网络又扩展到他自己的祖国印尼。

司徒眉生1928年出生于苏甲巫眉。1946年，他在日惹开往玛琅的专列火车上认识了苏加诺总统。这一趟专列火车运载总统一行到东爪哇玛朗市参加印尼中央国民议会[KNIP]会议，那年作为年轻的新闻记者他被报社派去采访会议新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眉生仍然和苏加诺总统家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注：译者黄元焕是原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印尼语文系教授。40多年前曾与司徒眉生在印尼雅加达著名的华文日报——《新报》共事]

(责任编辑 吴思)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读季羨林《牛棚杂忆》书后

● 李 普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的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也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羨林老先生把这一页记下来了，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书中说，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季羨林老先生认为，比较起来，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伤痕”，只不过是碰伤了皮肤。真正有“伤痕”的是许多开国功臣、大元戎、著名作家和其他许多年老的大知识分子。他期望这些人留下一些亲身经历的记述和教训，否则我们的子孙将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来。其实，何用等到将来，你若同今天的青年谈十年浩劫，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表示很难相信。这位老教授经过16年的期待和反思，才决定他自己来写这么一本书。这20万字记录了他那十年里的经历和见闻，催人泪下。我要再三说，他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一则他写的是北京大学；二则他是北京大学老资格的大教授，当时已经在北大当了20年东语系系主任，是写这样一本书最适当的人选。对起劲折磨他的院系里那几个高足和他聘请来的几个教师，他指姓而不道名，但是人们一望而知那是谁。他们人还在，这就是说，书中的记载都经得起验证。

北京大学成了新时代的“革命圣地”，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

北京大学历史上这可耻的一页，开始于那张奉命制作的造反大字报。这张造反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被肯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可了不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放，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大字标题为《北京大学七同志揭发一个大阴谋》，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立即“誉满全国”，成了新中国的“革命圣地”，每天前来朝拜取经的人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声势之浩大超过了30年前旧中国时代的延安。

季羨林写道：“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至鲜血直流。”

季羨林先生是在决心自杀的千钧一发之际遭到第一次批斗的。他盘算了几天几夜，想好了到圆明园的大苇坑中服安眠药自尽。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步出门。正在那生死关头，闯进来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把他押去批斗。如果那三个学生晚来半个钟头，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季羨林了。

这第一次挨批斗是“陪斗”，他还不是主角。他先是同其他几个批斗对象面壁而立，挨了耳光，背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腿上挨了重重的一脚。这些只能算是序曲，然后，大轴戏终于来了。猛听得霹雳一声：“把季羨林押上来！”于是上来两个红卫兵，抓住他的两臂拧在他背上，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压住他的脖子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他被命令低头、弯腰，再三被命令“再往下弯”，再三挨拳击、挨脚踢。他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下。“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警告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接着写道：“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批斗大会结束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会场，押上一辆敞篷车。他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向他投石头，打到他头上、脸上、身上。汽车只是向前开动。过了不知多久，车突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他踢下了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工人走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工人，他是认得的。忽然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

那些“革命小将”显然是从折磨别人得到快感的，特别是以虐待知识分子和自己的老师为乐

季羨林老先生这本书着重谈到了一个以折磨人取乐和特别是折磨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写了这样一些话：“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以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

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

他又说：“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又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只有我季羨林一人吗？”

这些话催人泪下。让我们再看看他是怎样受折磨、以及那些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是怎样以折磨老知识分子来取乐的。我们可以说他整个这本书讲的都是这件事，前面讲的他第一次挨批斗的情况，不过是序幕、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再引一点：

“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化子差不多。……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的。……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走。我还不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的罪孽就更大了。”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力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我仍然卖力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

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羨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这一段和下一段引文中的所谓“押解人员”,都是红卫兵,堂堂北京大学的学生!

干了几天活以后,季先生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押解人员命令他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驻军的医生,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他蜗牛一般爬了出去,爬了两个多小时,爬到了二百号,果然有一个解放军诊所。他看到了戴红领章的医生。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医生的脸色立刻晴转阴,扬手连说:“走吧!走吧!”季羨林接着写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把季老先生毒打了一顿;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打脑袋

季老先生这本书名叫《牛棚杂忆》,“牛棚”是俗称,其实应该叫做“劳改监牢”。那里开头贴了一张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一两天以后就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这两张告示,很符合实际,很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谁有权在手,谁就可以立法,谁就可以说了算。今天这样说算数,明天那样说也算数。他写道:“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我们在整天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了活,不管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分配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

书中说,这个劳改大院的晚间点名,后来成了北大最最著名最有看头的一个景观。季老先生说有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就是他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

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

“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的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等到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

季羨林老先生遭到过一次毒打。打手名叫张国祥,这是本书中那些歹徒的唯一的一个人全名。他是生物系的一个学生,看来季羨林并不认识,他同季老先生似乎没有个人恩怨。这个张国祥前一天晚上把季老先生戏耍了一顿,最后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这是预告,第二天晚上果然不再“仁慈”了,他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暴风骤雨般把季老先生毒打了一顿,主要是打头部,打头顶、打眼睛、打嘴、打鼻子、打耳朵。这个时期这个北京大学还有一些极其残忍的折磨人的办法:比如叫“罪犯”直对着太阳看,不许眨眼睛。又比如,叫两个“罪犯”面对面站着,两人头顶头,然后身子尽量往后退,于是他们两人全靠对方的头支撑着才能站住,如此等等。如果谁想问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们?理由简单明了,就因为他们是一所大学的头头或者它的某个系的头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大知识分子,是教授,甚至是某一门学术的权威。换句话说,就因为他们有知识。语不云乎: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之所以要摘引这么多,首先因为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其次因为我曾在北大工作过,当过政治系主任。那位“全程”同季老先生关在牛棚里的政治系赵教授,就是我的继任者。我是在中南五省最高的党委机关中共中央中南局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的。那里大首长很多,受大罪轮不着我。再说,机关人员年纪毕竟大些,发疯的程度比较轻。所以我虽然也挨过批斗、也“坐过喷气式”、也经过劳改、也受过辱骂、而且关过“单间”,经常受“提审”,但是没吃过耳光,没挨过拳打脚踢,没受季先生那么多罪。“文革”以后重逢北大的老同事,他们说,如果我

没离开北大,那时我身体又那么坏,肯定没命了。我的“罪孽”重得多,档案袋里还装着一顶“特嫌”帽子,能活着过来吗?

那种虐待狂从何而来,那种以折磨人为乐的恶欲是怎样养成的

季羨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多,特别是他再三提问,“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我想这也是许多人要说的话。这里我想探讨的,一是“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二是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三是这样对待知识分子、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严重?我们应不应当好好算算这笔账?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是正里巴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何以要那样歧视知识分子?我的提问被一位老友的反问打了回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由来已久,这件事的历史斑斑可考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我曾经这

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文献》,内中一篇文章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形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另一篇文章,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文章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

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

不过我还想再问问，何以那些革命小将那样敢于和那样忍心对待那些老教授、大学者、那样对待自己老师？我想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这里试着说一说我初步的一些想法，恐怕也还说不清楚。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至于怎样对老人，请让我转述“文化大革命”中有个年轻人的一段话。他说：“刚才我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人，看来病得不轻。我本想给他让坐，但是一想，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我岂不犯了大错误；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就坐着不动。”说这些，可能有点扯远了，现在还是来说说那些老先生们何以沦落到那样的地步，人人都可以欺侮戏耍一番的吧。

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全国解放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我们过去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

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许多大教授、大学者很难幸免。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55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55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鄙视，我想很难很难。

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最后不知道下落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季老先生这本书强调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他也就是关注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诚心向读者诸君推荐。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几位，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任何单位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也斑斑可考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单位，可以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

任意侵犯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尽然。早在这之前的许多时候,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在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大体上做过了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历史上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个,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文化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之故。这件事,下面马上就要说到。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也应该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正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

“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

更大的损害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至粉碎“四人帮”这一段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说,也是少有的。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

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算。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现在,我国正在努力追赶上去。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丧、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一文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过去我们中国人没个皇帝过不了日子,后来要个领袖。而英美这些国家的人,现在领袖也不要了,只要公仆

我认真读了季老先生这本书,季老先生谈到了他的文化观。我最弄不明白的是本书第257页的一段话:“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大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季老先生列举的那些“弊端”,第一项竟是“人口大爆炸”。我无意挑刺,但是这一点太说明问题了。看来季老先生信笔写来,似乎忘记了我们中国恰恰是“人口大爆炸”的大户,更忘记了其所

以成为特大的大户,是由于不允许违背人口越多越好的指示,拒绝听取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于限制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意见。马寅初是谁呢,正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开始周恩来也劝马氏做个检讨,简单几句就行;马氏坚持不表这个态,宁可被撤职。他说,真理所在,决不屈服;明知寡不敌众,也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是北京大学的光荣,值得大书特书。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就罢了,何以非要他做个检讨不可,并且何以不做检讨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一定要撤职呢?就因为我国严重存在着专制主义、存在着个人崇拜,存在着这种“东方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

我认为季老先生的这整本《牛棚杂忆》都是反对他自己那种文化观的,他本人的思想经历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十分真诚地述说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写道:“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是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这位教授先生怎样接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改造的成效,书中多次写到,也很真实动人。他写道:“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利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

耻的。”他接着写道：“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他接下去述说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他说：“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他还写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

这些坦诚的记述使我深感震撼，但是并不觉得惊奇。他给我们这里探讨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既曰“中国文化”，就是全体中国人或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拥有和习惯的思维，而不限于少数人。少数或者个别的有资格人士厉行专制主义、需要个人崇拜；那多数人呢，就拥护专制，崇拜大人物。那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奉行的是专制主义，那多数人奉行的也是专制主义。两者并无区别，因为他们共同拥有这种中国文化，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为这种文化所制约。后者中的某些人一旦取得了一点权力，立马跟前者一样，例如北京大学看管“牛棚”的那些红卫兵就是。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所谓文化，就是这样地起作用的。当然有例外，独立特行之士是有的，但总是少数。中国人民中少数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这种中国文化，建立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1911年我国推翻了皇帝，开头一二十年间，大多数老百姓惶惶不安，没有个真龙天子坐朝廷，叫咱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呢？久而久之，慢慢习惯了，原来没有皇帝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得有个领袖。

这同西方一些国家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只要公仆，不要领袖。而且这公仆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又是定期更换的。英国首相、保守党的丘吉尔在二战中功勋卓著，在他本国和全世界威望很高。英国人民提防他因此而做出损害人民权利的

事来，不失时机把他选掉了，换上了工党的艾德礼当首相。那是德国刚刚投降，日本还在挣扎，世界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再说说美国。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连任两届，从此成为惯例。二战期间美国人民破例选举罗斯福连任第三届又连任第四届总统，战后他们深感这种“破例”对民主太危险，为了防止总统垄断权力，威胁人民主权，1951年议会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连任总统两届以上。英美这两个国家这两件事，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对比之下，更可以看出季老先生对领袖的那种仰慕和那份忠诚的感情，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起作用的结果。

季老先生那种文化观并不新鲜。中国的志士仁人反对它和企图除去它，从而建立起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建立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季老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寄托的那种厚望是靠不住的，一定会落空的。中国文化岂有那么大的能耐。对于季老先生述说自己心路历程所表现的勇气和坦诚，我很敬佩。我自己也曾经深深陷入个人迷信之中，绝不比季老先生高明。我将继续反思。凡属我自己的事，就不在这里说了。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是我反思所得的一部分，谨此写出来向季老先生和读者诸君请教。

附记：本文初稿曾请几位友好指正。广东黄伟经是位著名的老编，十多年前主编过《随笔》杂志，7月29日来信说：“北大无光”，“文革”成“发源圣地”，当然是极好证明。然而我觉得，北大的“光”，最重要的是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相连。民主与自由，相关相存。“文革”中北大“无光”，现在“光”（民主与自由）就多了吗？恐怕还不好说。如若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北大之“光”云胡哉！他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我就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加了一个“最”字，成为《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2002年6月28日写完初稿，8月12日改定。

（责任编辑 叶正）



突破标准答案

——读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

● 林京耀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现在西方人、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都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吴江同志在最新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和青年朋友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前言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至今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这是经过党与国家的权威机构或部门指定的答案。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个“标准”答案被写在各种政治理论课、各级党校的教科书里和大量的通俗的理论著作中，并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给受众。这种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行政手段从苏联传到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也还有与这个“标准”答案不同的答案和理解，但一出来便立即被判定为“异端”，并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种政治帽子，被扣上这种政治帽子的人的处境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式的“标准”答案和理解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障碍而被拒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成为时代的要求。

吴江同志说：“听说目前有些青年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冷漠态度。”这里所讲的“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冷漠态度”的现象，恐怕不仅在有些青年中存在，在其他年龄层次中也都存在，这也是对过去生硬地灌输与现实脱节的理论教条的一种报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受什么“思潮”的影响而进行

批评、指责，甚至归罪于改革开放是无济于事的，也是错误的。把教科书上的几条原理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认为这就能回答、解决新时代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除了激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和使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看来，只有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甚至“采取冷漠态度”的问题，进而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来关心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吴江同志认为，与“没有一点历史感”的传统“经典原理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我很赞成这样来界定马克思主义，这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初衷和风格。以这个视角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利于“重新找回马克思”，也有利于引起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热情，这正是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所期望的。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和热情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这是正常现象，而非什么势力恶意煽动的结果，因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观念以及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略、策略等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超越时空的教条。因此，必须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和阐明的一切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即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它仍然有效，何况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马克思的一些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在提出来的

时候就不一定是对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一点,吴江在书中都作了论述。

《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之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形成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它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圣经”,具有普遍和永久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承认,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杰出和伟大的历史文献,150多年来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和“宣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直到1872年,即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还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所提出的一些革命措施和意见已经不适用或者说“过时”。直到19世纪末,恩格斯又提出不宜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只是他的这个意见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看来,“宣言”中有些“基本原理”不能说“还是完全正确”,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的时候,历史地理解他们所提出和发挥的理论(包括“一般基本原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

“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名言。也是被我们背熟了的经典原理,也是指导我们分析、观察、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解剖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把锐利的“解剖刀”。但是把整个社会科学一概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问”,这就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更远、更绝对化、片面化了。实际上,这个经典原理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是同他的唯物史观(即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即“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李大钊是正确的。正如吴江所说:“本来,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论都是唯物史观题

中的要义,它们都包容在唯物史观之中。”“如果按照唯物史观来表述人类的历史,我想应该说这样两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而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各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吴江的两句话同《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有实质性的差别,“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第二句话,“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是第一句话。按照吴江的意见,第一句话中的“生产”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据此,吴江1988年就主张“还是提‘以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较好”,并以此为题写了专文。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及其产业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至于阶级斗争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已经和正在进入知识型社会中的作用,恐怕不能再说当代社会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存在的,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了,现在需要做的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段当代人熟悉的名言,正如吴江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被许多人忽略了,但这恰恰是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最高理想”的经典。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宣言”所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前这往往被认为是鼓吹“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所以尽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但也很少宣传,更不把它看作是经典言论。

恢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解决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主义问题,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与“不过时”的争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本身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宽松的环境。

(责任编辑 吴思)

彭德怀的厄运是如何法定的

——重读《庐山会议实录》感言

● 汪澍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其亲身经历对1959年庐山会议的本末始终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述,中外学者均奉之为信史。11年前,我就带着兴奋的心情,初读过此书的内部发行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那次主要是因为1959年自己在地方上也曾被罗织入罪,颇想到中央的会议中去寻根探源。最近又重读了作者惠赠我的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回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对毛泽东原拟在会上继续纠“左”,后来却转向反右倾的原因,思忖较多。

提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一般总以7月23日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为界,将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毛泽东开列18个问题让大家漫谈讨论,气氛比较轻松自由。7月1日夜,召见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尤其随便,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实录”增订本,第62页)这样面折其非,主公亦毫不在意,照样谈笑风生。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不提这些口号了。又说:“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一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实录”增订本,第63页)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到

10日在小组会上有7次发言与插话,坦诚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意见,但有的意见并没有来得及畅谈。彭德怀感到纠“左”仍不够有力,便于12日下午去180号(美庐)向毛泽东面陈所见,因毛正在睡觉,未果。13日便决心写信,14日下午送呈。“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自述》)这就是写信的动机。

彭的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增长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实录”增订本,第101页)

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

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实录”增订本，第101—102页）

彭德怀的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言辞恳切的。其内容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比周小舟、李锐等在会议前期被毛召见时的直言无忌，显然更易为人所接受。但毛泽东却反而感到刺耳，认为其中有重大问题。7月16日，他给这封信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又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从17日起就对这个“意见书”展开讨论。到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便直指彭德怀以及与他观点相同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为“动摇分子”，“离右派30公里”。从此，会议的中心由纠“左”转向反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接下来，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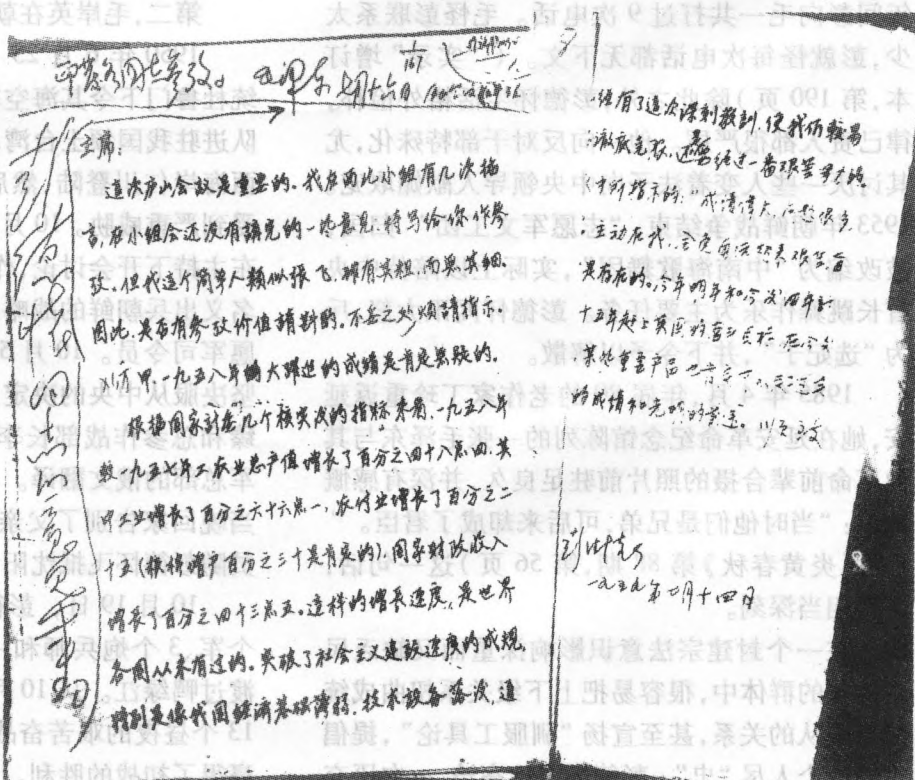
会，进一步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斗争，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明言意在纠“左”，还准备形成一个“会议纪要”，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反右倾，并恰好选定彭德怀来开刀祭旗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微妙的问题。我考虑，至少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冲突

彭德怀出身贫苦，小时候要过饭，长大了当过堤工和挖煤工。以后投军，又组织“救贫会”和参加共产党。1928年7月，在白色恐怖浊浪滔天的时刻，他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他率领红五军主力奔向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相会合。从此，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指挥千军万马，和兄弟部队相配合，纵横驰骋于湘江、赣水与闽山之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跨越千山万水，冲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彭德怀与毛泽东的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交往是很邃密的，彼此以“老毛”、“老彭”相称。有事商量，如果碰上一个还在睡觉，把被窝掀开就是。纵然平日也可能有争论，总还是一种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彭德怀1958年4月从广州到武昌开会时同李锐谈起往日的情景，还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1957年反右以后，其绝对权威与苏联的斯大林在世时相当。如果撇开社会形式的差异，也可以说同我国历朝的皇帝相埒。毛泽东并不忌讳这一点，他多次自比于秦始皇。至于昔日战争年代的功臣宿将，此时都雁行有序地安排在各个部委，按照国法朝章各司其职。彭德怀担负着国防部长的重任，地位可谓显赫，但他与毛的关系却再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般亲切与随便了。有事求见主席，现在要先打电话相约，还要经过中央办公厅批准安排。1951年有一次，因朝鲜战场上的军情十万火急，彭德怀从前线赶回北京搬兵，一到毛泽东住宿的玉泉山别墅就被警卫挡住，彭德怀等得不耐烦了，便一手推开阻拦他的警卫，大步闯入毛的寝宫。这样犯禁的事，可一而不可再。从1949年到1959年，两人同住在北京城，10年间彭向毛一共打过9次电话。毛怪彭联系太少，彭就怪每次电话都无下文。（“实录”增订本，第190页）除此之外，彭德怀生活格外俭朴，律己责人都很严厉。他一向反对干部特殊化，尤其讨厌一些人变着法子向中央领导人献媚取宠。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文工团”归国，被改编为“中南海歌舞团”，实际上以陪侍中央首长跳舞作乐为主要任务。彭德怀闻讯大怒，斥为“选妃子”，并下令予以解散。

1985年4月，年届80的老作家丁玲重返延安，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影的照片前驻足良久，并深有感慨地说：“当时他们是兄弟，可后来却成了君臣。”（见《炎黄春秋》第88期，第56页）这一句话，讲得相当深刻。

在一个封建宗法意识影响深重而又缺乏民主体制的群体中，很容易把上下级关系扭曲成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甚至宣扬“驯服工具论”，提倡对领袖个人尽“忠”。彭德怀秉性高洁，一向厌弃那一套封建伦理，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却不

惯于对领袖个人俯首称臣。为此，毛彭之间难免产生一些隔阂。再加上，彭德怀是一根直肠子，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一肚子的权谋韬略。在军事斗争中，他一贯英勇善战，但在更为复杂与曲折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认识却多少有一些跟毛泽东不合节拍的时候。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中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实录”增订本，第193页）。所谓“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最突出的内容就是百团大战。历史事实表明，此战对打破敌人对我的“囚笼政策”和对国民党的诱降阴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正面作用；由此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警惕，以加倍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困难。但既然主张全民抗战，就不能总是强调“保存实力”，只有待机主动出击和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和夺取胜利。为此，作出一定的牺牲也是必要的。多年来，对百团大战的是非功过一直争论不休，诸如此类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往往会形成难解的“宿怨”。

第二，毛岸英在朝鲜遇难所造成的伤痕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其海空军入侵朝鲜，并指派第七舰队进驻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军又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然后大举向北推进，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会讨论，作出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并提请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10月5日，彭德怀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10月7日，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商定调毛岸英充当志愿军总部的俄文翻译。毛岸英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当晚回家告别了父亲和妻子，8日即同指挥所人员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3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约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从10月25日至11月7日，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奋战，歼灭敌军1万5千余人，赢得了初战的胜利。稍事休整，又准备展开新的战役。

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朝鲜北部昌城郡的大榆洞，敌军常派飞机前来侦察骚扰。1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电，告知美军近日将派机轰炸志愿军指挥所，提醒中国方面预作防备。中国方面得报后，聂荣臻和毛泽东接连给彭德怀发出两封电报，要他设法转移指挥所。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志愿军发动新战役的紧急关头，指挥所来不及立即转移，只好把离指挥所200多米的一个大矿洞，暂时作为志愿军的防空掩蔽部。24日，参谋长解方下令：晨晨4时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员全部进洞。

25日上午10点多钟，敌机破例没来，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离开矿洞回到指挥所。11点左右，响起了防空警报，毛岸英等急忙进洞隐蔽，见F-80战斗机12架呼啸着掠过指挥所向北飞去，毛岸英和高瑞欣又重新回到指挥所。不料远去的敌机群中的一架忽然掉头飞回，对着指挥所的木板房进行俯冲，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指挥所顿时火光冲天。值班的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急忙跑了出来，毛岸英和高瑞欣钻入桌子底下躲避。当彭德怀听说毛岸英没有出来时，心知不祥，一边大呼：“快去救人”，一边拔腿往外跑。警卫员景希珍抱住彭总不放，彭总急得大骂：“你放开老子，放开，再不放开我毙了你！”小景哭泣着说：“你毙了我也不松手。”敌机还在盘旋，轰炸，凝固汽油弹爆炸后产生了高达华氏2000度的液体岩流，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等人都急赤白脸，无计可施。毛岸英、高瑞欣就这样为国捐躯了。

为了毛岸英的牺牲，彭德怀深感愧疚。他亲自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不好下笔，短短几行电报，踌躇了几个钟头。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后，为了防备敌机空袭北京城，毛泽东临时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当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拿着彭德怀的电报去新六所面见毛泽东时，刚刚说到志愿军指挥所被炸，毛泽东便生气地说：“这个彭德怀！我拍电报让他转移的嘛！”及至听说岸英遇难，毛的身子微微一颤，半天没有作声。他想镇静一下情绪，伸手去拿烟，手抖得厉害，两次都没有从烟盒里把香烟抽出来。警卫员李银桥帮他拿烟点上，他怔着



彭德怀在“文革”中遭批斗

神吸烟，眼圈一红，便滚淌下大滴大滴的热泪，稍后又发出一声悲怆的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有过几次婚姻，生育并不少，但在战乱中长大成人的儿子只有两个：次子岸青幼年流落上海街头时就因脑部受伤致患精神分裂症，无法治愈；长子岸英幸而在艰难困苦中茁壮成长，为父者正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旦遭此劫变，父亲的殷殷寄望便化作了深深的隐痛。

埋藏在心底的伤痛，平日总是隐忍不发，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与彭德怀发生争论时，便禁不住突然发作了。他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实录”增订本，

第137页)这是表示他对彭德怀有意见的“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承担肇始者的责任。这段话何以要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成语开头,有些令人费解。再隔一段,他对此作了解释:“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实录”增订本,第139页)这些话似乎偏离了庐山会议的主题,只是由于彭德怀对他提出批评触发了往年毛岸英在彭德怀身边遇难的隐痛,旧恨新嫌一齐涌上心头,便并发出这一腔怨忿之情。

第三,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思想分歧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犯上了一块心病。他担心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中国,特别是1958年他抛出“三面红旗”酿成灾难以后,更担心中国也会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出来跟他算账。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最初他想到的并不是“文革”时被称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刘少奇,而是他认为历史上有“犯上”表现,近来又公然倡议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

早在七大时,彭德怀就不赞成党章上写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佩服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也需要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1959年9月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1956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为此对彭德怀深具戒心。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要对付分裂,就是指的彭德怀。(“实录”增订本,第193页)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彭德怀:“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录”增订本,第73页)。查毛著《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

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实录”增订本,第744页,1996年上海合订本)把1958年4月与1940年3月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政策同他当年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竟是一模一样的。无怪乎三个月后(1957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向他反映“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与问题,毛泽东立即判定为“下战书”,给他逮个正着。

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毛泽东又说:“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实录”增订本,第132页)十六字诀这次又加上了“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八个字,更见系统完整了。而且这一套东西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已经熔铸成为一种性格了。现在一再听到彭德怀“犯我”的“坏话”,能不重重地给予回报吗?!

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假若当年彭德怀没有发出那封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和问题的信,1959年庐山会议的结局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根本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许反对个人崇拜。既然他早就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一场排除“隐患”的斗争就势不可免。时间或早或迟,等候着彭德怀的是注定了的厄运。

话又说回来,假若1959年的庐山会议没有彭德怀上书而平安无事,那也并不等于从此天下太平。只要中共中央没有从根本上纠正个人崇拜的独尊意识与超高速、穷过渡的战略思想,中华大地就免不了灾祸频仍。献身革命的精英中总会有人出来为民请命,毛泽东也势必会为维护“三面红旗”和领袖权威而发动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可能由起因的偶然性而有差异,但反右倾的方向和必然性却又是铁定无疑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 致 中)

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

● 陈徒手

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以治愈心病。

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这里有一个外因,就是陈伯达刚刚创办公理论刊物《红旗》,在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别出心裁地约请赵树理为《红旗》写小说。赵树理把它视为“光荣的任务”,不时在心里惦记着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事隔4个月,赵树理8月20日写信给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他在信中写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起了一个带有学问意味和个性色彩的题目:《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应该如何领导”这种句式颇让后来的批判者不快。赵树理或许事先有些预感,为了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写作时曾换过四五种写法,竭力想把那种口气去掉。他坦率地告诉陈伯达:“这篇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不知道陈伯达看了信和文章后的感想,只是他(或者是《红旗》编辑部)在晚些时候将它们转给了作协党组。后来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笔者注意到,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有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写下几句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

所谓“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以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

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中国作协党组由此于1959年11月24日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批判赵树理的战火悄然点起后,老实的赵树理又交出另一封给陈伯达未发出的信,其观点比第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公布的1959年元宵节致邵荃麟的信,更给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他再次表露了“进退失据”的感受:“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赵树理痛苦地表示:“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他在信中随手举了四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

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

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很不和谐。赵树理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境地,他左看右看,终于停笔了,自己解释其中原因:“这封信所以没有继续写下去,是感到会使领导上看了前半截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

这封未完成的信稿,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虑、下笔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页稿纸中,用了几种墨水,表明作者断断续续在不同地点写信,拖了很长时间。

尽管赵树理后来有意设防,但事情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要严重,这几封信导致一个多月的全会批判、小会帮助。

当时中宣部已揪出九条“大鲨鱼”,并且开了中直系统现场会推广经验。作协反右倾初期过于冷清,被上级领导部门批评为“温情主义”。于是,作协的整风运动层层加码,10月底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从11月4日开始批判王谷林、王鸿漠、高炳伍、冯振山等四位中低级干部。斗完后,下一步目标自然而然对准作协中层以上干部。当时明文要求整肃领导层中的动摇分子,提出“抓得紧,搞得透,搞得细”的口号,十三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先是楼适夷被抛出,赵树理和郭小川紧挨着就撞上“枪口”。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

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麟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



40年代,赵树理(中)与陈荒煤(左)、于黑丁在山西合影

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山西省委领导陶鲁笱、副总理谭震林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11月24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词已相当严厉:“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误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

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赵树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们的辨别能力,太不相信同志们有帮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

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方式不尽相同,譬如,萧三每批一段赵的言论,就引申一句:“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形容赵的思想深处像一座“堡垒”,是“很难攻下的马其诺防线”。他质问:“看,这样一所建筑,还有什么好砖吗?”他好心建议老赵要有新鲜事物感,去工业中心和工人中生活一个时期,多快好省地改变世界观,不要有抵触情绪。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称:“党组采取展开辩论的方式,由同志们作有系统的发言,批驳其各个论点,然后由赵树理同志答辩,答辩后再由同志们发言辩驳。”实际上,赵树理已经难于从容答辩,他只是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甚至对耐火砖、造纸厂建造是否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缝纫工厂对解决家务劳动所起作用等小枝节问题都谈得很细,让大家听了不胜其烦,不知老赵此时用意何在。

11月18日下午,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他固执、为难的情绪又通过这几句话,委婉地表露出来,让精疲力尽的与会者添了

几许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邵荃麟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邵承认，老赵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强迫命令等，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现象。他引用毛泽东一个内部讲话说：“六亿人民的大运动不产生一些缺点，那才是怪事。”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理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会议上汇总了若干个问题，请赵树理回答，近乎最后通牒：1.中央文件当中有哪些对情况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希望具体谈谈；2.赵树理同志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谈谈；3.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赵树理同志为什么看不见大量存在的先进事物，老把个别地区的产量问题孤立起来谈……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他顾不上回答这些带有陷阱意味的提问，11月23日递交一份报告，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 11月23日

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原因，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

作所为。最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苦思冥想寻找出路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严文井作为当时党组负责人之一，后来透露了其中一些内情：“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1997年5月19日口述）

赵树理有惊无险，在来得突然的转折时期，他诚惶诚恐了一段时日。到了1960年3月，他交出一份书面检查，本性难改，又自动恢复了对公社等问题的解释权，他说：“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他，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作协总支1960年2月21日做了整风总结，对赵树理留下了几句化大为小的评价：“由于他还未彻底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在他身上保留着狭隘保守的农民观点，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形成正式文字，内部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没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

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对赵树理来说，心灵的风暴虽然也已平息，但打击却是毁灭性的，让他几年间都难于平静。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不仅仅创作上出现衰竭，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曾经参加当年批判大会的杨子敏（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回忆说：“会场设

在文联大楼四〇一室，赵树理坐在圆桌中间。看上去他很沉着，很认真。我就注意到，每逢开斗争会，赵树理有一个动作就是嘴里叼着烟，手上不断划火柴，有时一盒火柴都划完了，烟还没点着。他是在不自然的状态下有这些动作的，看得出心里不平静……”（1997年12月25日口述）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评论家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表示：“那时空气非常紧张，老赵有压力。但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老赵说话有时让人听不清，一方面是口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说话的特点。以前大家就说，老赵小说写得那么出色，可讲话就怎么听不懂？看他在会上吃力发言，在心里对他是同情的。开会时他拿着一支笔，随手在纸上划几个字，不像其他挨批者那么认真记录。会开得很晚，冬天又冷，散会后大家都急于赶回家，而老赵往往坐在那儿发愣，想半天，动作很迟缓。有时金镜就陪他坐一会儿，说话无非是‘注意身体’之类。”（1997年12月26日口述）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当时康濯在和平宾馆写长篇《东方红》。作协党组曾有意让康濯做做赵的工作，康濯12月中旬给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反映了赵对批判发言中一些不实之词的意见，认为他的看法并非如此。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饺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康濯在信中谈到，赵的改变相当明显，大会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康濯夫人王勉思回忆道，当时中东政局动乱，老赵时常唠叨说，我还不如出去打游击，去支援世界革命。

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20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话，

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1989年8月29日口述）

经历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首先对1959年的批判表示歉意：“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摘自会议记录原稿）

周扬在会上几句话定评：“他对农村有自己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对赵树理又是一面倒，以致1964年8月3日作协党员大会上批判者为此愤愤不平：“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做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其中谈及赵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根据三年来农村的情况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去年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来看，赵树理同志所写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当时根据以上文章和信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邵荃麟很用心在报告原稿上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一句原来用语是“不妥当”，是邵改为“错误”。可惜，赵树理没有及时看见甄别报告。因为1962年夏秋，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作协已经不便拿出这个报告给当事人阅看。

等待赵树理、邵荃麟、周扬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政治风暴，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他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70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

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对1959年大批判他一定会有新解，一定会记住当年连夜赶写检讨稿时冒出的一句话：“我54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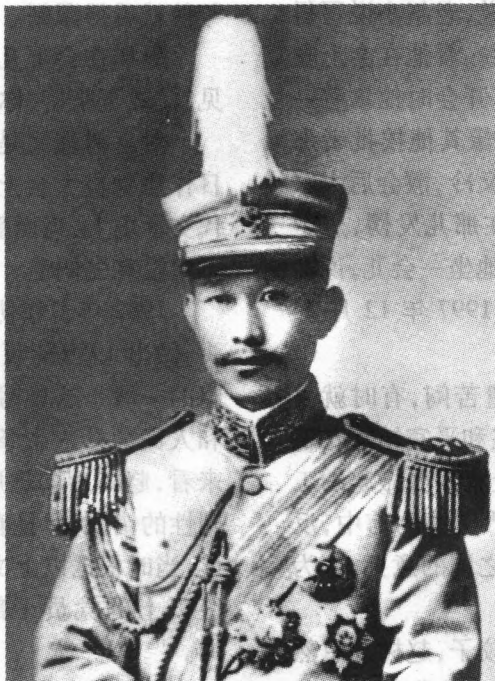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吴思）

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

● 傅国涌

蔡锷(1882-1916),一代名将,因率先举旗“为国民争人格”、推倒袁世凯帝制,而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他出生之际,正当清朝摇摇欲坠的大变动时代。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到长沙岳麓山下,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深得老师的喜爱,他向比他年长十岁、追随康有为倡导变法而名动一时的梁启超先生透露了“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以后,蔡锷和梁启超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思想上深受这位恩师的影响。

1898年9月,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血腥镇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次年,蔡锷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一起东渡日本,前来投靠梁启超,梁安排他们先到康、梁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为了达成这位学生实现他的志愿,直到1902年,梁启超才在日本友人大隈伯的帮助下,让蔡锷等三名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蔡锷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近六年,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其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表过文章。



蔡 锷

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后擢升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举兵响应,被推为总指挥,随后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袁世凯觉察到蔡锷这个人难以为自己所用,将其调往北京,糜以虚职,任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加以笼络和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狼子野心已是路人皆知,蔡锷表面上每天喝酒打牌,游山玩水,出入风月场所,甚至毫不犹豫地于帝制意见题名册上签名赞成。

实际上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就到天津密访梁启超,共商大计。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蔡锷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梁启超很快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时的他可以说“握舆论界权威”,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蔡锷每隔几日就要去一趟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已定,先后南下。”(梁12月18日到上海,蔡12月9日到云南)临行前他们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蔡锷《盾鼻集》序)他们认为反袁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

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心研究学问；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

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故意逢人便说：“梁先生是个书呆子，只会空谈，做不成什么的，不必管他。”11月中旬，他终于摆脱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潜入天津租界，又经日本、香港，12月中旬回到云南昆明，受到云南父老子弟的热烈欢迎。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

联名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领军人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由桂入粤；唐继尧以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云南独立前后，所发往各方面的电文，大都是梁启超预先准备好的。

从湖南时务学堂到自立军起义，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一直到护国反袁，蔡锷都是梁启超的忠实门生，当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时依然执弟子礼甚恭。

1912年3月3日，时任新军标统的蔡锷领导云南起义，并被推为云南都督，致函尚亡命海外的梁启超，称革命胜利“探本究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可见他对老师的推崇。6月6日，他专门致电袁世凯等详细列举了梁启超的贡献（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宣传爱国、平等、自由、民权等）。称“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要求袁世凯“敦请回国，优予礼遇”。10月在梁启超回国后，他致电袁世凯一方面欢迎老师，一方面“以谢大总统为国求贤之盛怀”。还致电各省都督请他们都致电欢迎，可见他对这位恩师的热情。在护国战争中他邀梁前去，说他如能去“不止十万雄师”。战后说，“吾师负内外重望，为全国之真宰”，评价极高。

在护国战争中，梁启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6年1月8日，梁启超从上海致函蔡锷，指出西南责任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提出了一



梁启超

条很重要的团结多数的政策，对护国运动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月25日梁启超致函广西的陆荣廷，要他响应云南起义，并指出桂军将来可以向广东发展。2月上旬，向来对梁启超甚为仰慕的陆荣廷，在接到梁启超的长信后，即派出专使赴沪，欢迎梁启超前往广西襄助起义。梁氏欣然接受陆荣廷的邀请，前往广西。3月13日，陆荣廷以陆、梁两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电，要袁辞职，并限24小时内答复。其时，梁启超还在赴桂的途中，并未到达广西。

蔡锷在四川前线，梁启超给他的函电就有近十份，在病魔缠身的1916年9月蔡还写过一篇《梁启超函牍跋》，说在军中得先生八书，动辄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蔡锷在戎马倥偬之中也频频给老师发函电，现在留下的就有五、六份。在战事告终，蔡锷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梁启超的函电最多，现已找到的有17份，时间从6月21日到9月间，前后不过三个来月（中间还在上海见面过），几乎是三天就通一次函、电，往来之频繁可见一斑。梁启超还给这位心爱的门生请过外国医生。师生之情，让后人感动。

梁启超对这位学生曾寄予重望，1913年6月中旬，二次革命迫在眉睫，他电邀蔡锷进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蔡锷则复电提出组织内阁的人应具备的几项资格，说“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1916年5月14日，他致电蔡锷说这次起事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第五书中说，“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棘（下加“人”）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希望能用蔡锷的力量造成西南的政治新局面。蔡锷因病离川、去世，也击碎了梁“庄严邛、蜀、滇、棘（下加“人”）”的思想。

面对八省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他在羞愤忧惧中黯然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锷实践“成功不争地位”的誓约，辞

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政府以其有功民国，擢其军衔为陆军上将，并多次敦劝他继续留任，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不再做官。实际上他也有病。护国举义之初，已是带病前往。军旅倥偬，吃不好，睡得少，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他本来急着要去医治，但自己的军队需要收束，四川的社会秩序也需要维持，他抱病坚持把各方面事情安排妥当才离开岗位。民国政府不许他辞职，四川老百姓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他还是毅然地走了。他到上海和梁启超会见时，已瘦得不成人样，喉嗓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老师几乎都认不出他的学生。北京政府派人欢迎他北上，他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发现患有喉癌，已病入膏肓，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12月5日，蔡锷的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准备返湖南故乡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执紼号恸者数以万计。梁启超率领弟弟启勋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往蔡锷灵前奠祭，悲痛至极。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说：自从你跟随我学习以来，转眼就是20年了。长沙课室外的提问，东京住所交谈的笑声，至今仍历历在目。尔后书信往来，魂梦相依。去年秋冬间，为护国而秘密策划，以及分手时的相约决心，一字一句，永远刻在我的心上。你在发愤治军以后，已决定为祖国献身。但辛亥革命起义时你没有死，护国战争中你也没有死，现在为国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可惜的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再有什么建树，为什么不降罚在我的身上而降罚在我的学生身上呢？本来是松坡应该哭我的死去，如今却是我为松坡的逝去而哭，怎能叫我不悲痛啊！

梁启超在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纯洁，毫无权利思想；说他反对帝制，举义云南，“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说他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说他立志甚坚，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他特别提到举起护国旗帜前夕，蔡锷曾说过这次举事如果不成，决不亡命海外，“使国事更不堪问”。誓言如果失败，“情愿身亡”。蔡锷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一誓言。所以他称自己这位得意门生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

梁启超送给蔡锷的挽联上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1922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六周年纪念日时，梁启超代表南京学界，以《护国之役回顾谈》为题进行公开讲演，他说：“提起今天的纪念，人人都该联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锷。”当时“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我们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纪念，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他最后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

1923年，梁启超倡议在北京设立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认为这是给蔡锷留下唯一可资纪念之物。在《松坡图书馆记》一文中，他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梁启超与蔡锷的深厚情谊，由此可见。

（责任编辑 吴思）

订份《文史春秋》 知识、趣味双追求 奖您越南风情游

《文史春秋》杂志是纪实性文史综合月刊，重点选编中国和广西近现现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内幕秘闻披露，历史见证，海内外名人成功之路，传统文明新角度发掘，珍贵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军警谍史料和社会百态等纪实性文章，知识性、可读性强。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权威可靠，具体生动，图文并茂。荣获第四届广西优秀社科期刊称号。

邮发代号：48-93
定价：4元 全年价：48元
社址：广西南宁市桃源路3号
邮编：530021
电话：0771-2836920



2003年继续举办有奖订阅活动，每位订阅者均有机会中奖，到越南的首都河内以及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著名景点下龙湾等地享受越南风情游乐趣（名额10名）。读者只需于2003年8月31日前将该年1-8期《文史春秋》杂志抽奖期花寄回杂志社即可（复印无效）参加抽奖。



病中随想

——关于法治与德治,法制与法治,先进文化问题

魏一李

● 任仲夷

半年多来,因患病住院,“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的过程中,出于习惯,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德治”与“法治”的书上题了两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有所区别。

(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在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

(二)关于“法治”和“法制”。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包括各级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

(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

上面谈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大家参考。

附:任仲夷同志的来信

我住院已半年,现在治疗情况尚好。两个月前,我把在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改为一篇短文《病中随想》,现寄给您审阅,不知可否在《炎黄春秋》上刊登一下,如有不妥,由编者改一下。

任仲夷

2002年8月8日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 李一鑫

胡绳晚年退休之后，本着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天职和良心，凭着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自信，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中有民粹主义倾向。这是向一个重要理论禁区的大胆冲刺！多年来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个问题，因而，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还是对于开展理论批评和学术争鸣，都具有很大开拓创新意义。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理论界并且远远不止理论界的一片震动。有人拍案，有人雀跃，有人深思，有人诅咒。

但是胡绳没有来得及把如此重要的题目深入做下去，就离我们而去了。他把这一极可能在他脑子里盘桓很久的深刻思索留给了后人，特别是现代的中国人。

他为什么在垂老之年，以病衰之躯，在尚有力气说话的时候，留下这个他已无力完整阐述的问题呢？而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必须接过这一重大思考题，继续把它想清楚弄明白？

因为，这远不是一个陈年历史问题，它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意义。

以笔者的浅浅功底，无疑是不能说清楚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这里只是想重新提起理论界前辈留下的话头，说点看法，引起方家谈兴。

民粹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

民粹主义首先发生在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初叶的俄国，绝不是一种偶然。当时的俄国，尽管经过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但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乃至政治制度，都还比欧洲落后许多。有鉴于此，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进步思想家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等

革命先行者们的影响，在当时的俄国大学里和文化圈中，涌出了一大批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高举反沙皇暴政、反农奴制度大旗的同时，还心仪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到 19 世纪前半期，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区——欧洲，上升中的资本主义已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矛盾问题，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正应运而生，继而在伦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面世。于是俄国那些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们，力求寻找一条有别于欧洲的新出路。他们否认俄国已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认为俄国应避免重蹈西欧前辙，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民之精粹自居，以代表人民命运和历史趋向的先知先觉者自命，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运动，推翻沙皇政府，直接变封建专制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一个个民粹派组织纷纷诞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叫“土地和自由社”。他们声称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俄国历史悠久的村社组织——农民公社就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只要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成功，通过有了自己“份地”的“自由”，农民实行“村社自治”，就可自然而然地达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者虽然自称“人民之友”，穿上农民衣服躬身下乡，要求其成员“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向人民说教”，但是在实际体会到农民的保守、狭隘和缺少集体观念之后，队伍中又冒出“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慨叹。他们也就只好积极地扮演“英雄”，转而进行暗杀沙皇的单独活动，企图通过慷慨悲歌的

个人行为实现其理想。基于这种唯心的英雄史观,而有待“解救”的农民的小生产属性,又决定了农民们只是各不相属的“一麻袋土豆”(马克思的形容词),因而,民粹主义进行的革命只能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携来人间的“革命”,是擅于口吐珠玑而鲜能干成实事的精英们的“革命”,是少数人代替人民革命而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在19、20世纪之交,民粹派出现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人却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走向极端和反动。

早期俄国共产党人如何批判民粹主义

早期曾是民粹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是在俄国最先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严厉批判民粹派所谓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指出俄国已经卷入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历史大潮之中,不可能不发展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最终会使工人阶级壮大,促进革命的发展。所以,俄国所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则着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民粹主义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活动,得到过当时还在世的恩格斯的肯定。

其后,列宁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对民粹主义作了最全面的批判。他指出民粹主义包含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二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并夸大这种“遗产”的“现实作用”;三是“对知识分子和法律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而把这些因素看作是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力量。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生产的能力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认为,民粹主义者排斥资本主义而想要直接建设小生产者天国的理论“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同时也公正地指出民粹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地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他们“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口号作掩护”,但“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这些批判,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世界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都是极其深刻而又富有长远、普遍的警示作用的。

不难看出,俄国民粹主义不过是欧洲的民主潮流和风靡一时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影响,与资本主义欠发达而又缺少民主传统的俄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脱离历史实际、既不懂资本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为何物、夸大上层建筑和个人作用的唯意志论高调。这一运动尽管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但却不能不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和“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皆列宁语)。

苏联建国后的民粹主义回潮

尽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曾经大力批判民粹主义;尽管列宁早在1918年就设计了以税收制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业及私人资本存在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时,强调这一政策要“认真地长期

地”实行；1923年初他距逝世仅一年时仍谆谆囑告：“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论合作社》），“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但是，这些都未能避免深埋于俄国土壤中的民粹主义后来变相出现并为患的可能。

问题首先仍是出于对建设社会主义条件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明确地认为，共产主义（当时还没有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两个阶段）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必须由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成。但列宁在1915年曾设想，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爆发，而后得到更多西方国家革命的响应和支持。斯大林则据此提出“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尽管颇有争议，但这一思想仍被1927年的联共十五大通过。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斯大林就必然要抛弃他压根儿未曾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即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于是在1928年，在全国仅有两台联合收割机，五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大部分土地用木犁耕种的条件下，发起为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而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运动。除提出“消灭富农阶级”，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加快由商品流通向产品分配过渡外，更横暴地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开展大清洗运动，使得冤案迭出。从而不可避免的则是，个人迷信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下的人民仍然只能扮演“群氓”，而民粹派未赢得的“救世主”之冠冕，却堂皇地加在共产党领袖头上了！

这岂不是执意回避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道路和夸大个人意志力量的英雄史观的回归吗？为夸张功绩，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尽管他在某些方面批判斯大林）竟也说苏联将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政权更换，并不意味着深层社会土壤的更换。土壤在，民粹主义回潮就不足为奇。苏联沉溺于个人迷信达1/4世纪以上，印证了英

雄史观之为物何等顽强。而只要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和过分集中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就一定空谈，出现失误也就难于纠正。这是苏联最终垮台的重要内因之一。

我个人认为中国建国后曾经产生过民粹主义倾向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时期，许多方面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恰恰是在建国后，1953年开始全国掀起学习《联共党史》9—12章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的高潮，不但基本上模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上，相对于我国更其缺乏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来说，所表现的唯意志论更是创造了“中国特色”。在“只争朝夕”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发明了“三级跳”式的社会主义速成之路：50年代初就盛行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1954年公私合营，紧接着在1956年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没有问题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定息，算是从经济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接下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兴无灭资”，这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主旨。

在农村，也进行了一个“三级跳”：由土改后的互助组，到“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进而到集体劳动、挣工分（象征农民劳动已工资化）、砸锅炼钢吃食堂、“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民公社。在制造了这种贫穷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竟向世界欢呼道：“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天真吗？从俄国民粹主义，到某些好心而自信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不惜付出努力甚至付出鲜血为之奋斗的。虽然从来并无“唯意志论”这么一种学术理论，但人们言传意会，把这顶桂冠赠给过于迷信个人意志者，确乎传神之极。

唯意志论长期盛行，与因农民占绝大多数而没有也不可能民主传统，与因封闭而不了解世界大势，与因感恩而迷信个人，与力图速成而极“左”，与视平均性的贫穷为“社会主义”，是一串顺序相关现象。

这种“大跃进”（跨越阶段）式“社会主义”，民粹派未能办到，却由共产党人借助专政的力量付诸实行了，据说理论根据是“薄弱链条”和“一张白纸”（事实上这恰恰是国情提供的反证和反讽）。毛泽东批评某些不同意见者“像小脚女人”，斥责他们看不见“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凤阳、温州以及更多地方的老百姓却用隐蔽而顽强的行动说明了他们自己的积极性所在！

如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对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问题。扼杀这种“自发势力”，实质上就是扼杀小生产者向工商业者转变的积极性，扼杀民间生产力成长的积极性。下面一桩发生在50年代初的故事非常发人深思——

1951年7月，山西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

列举一些事例后称：土改后农民自发势力有向富农方向发展之虞，应对私有基础逐步加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刘少奇阅后批示道：“土改后……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此表示害怕，企图加以阻止。……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表现。”但毛泽东的批示却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显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种分歧，是新中国建立后应该进行相当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历史发展已清楚证明谁是谁非。但由于当时党和国家制衡体制上的缺陷，新中国终于未能在其发轫之初避免那一大段令人扼腕痛惜的弯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朴素的真理性认识得来何等不易！因此，邓小平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劝他们不要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这不仅是诚恳的、负责任的、真正朋友的忠告，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告。

（责任编辑 致中）

科技汇合 情理交融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科技文萃》月刊



科学性
思想性
知识性
趣味性
资料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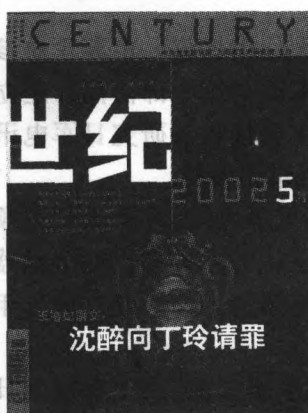
欢迎订阅 2003 年《科技文萃》

每期定价 10 元，全年 120 元，国内邮费在内
邮发代号：82-93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直接向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订阅，随时收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七棵树下北京纺织仓库内
邮编：100016 电话：(010)84313380 联系人：陈秀文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朝阳八里庄分理处(20114-04)
银行账号：02000038090661059-72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

免费索阅 欢迎试读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 邮发代号 4-557



沈醉向丁玲请罪

《世纪》杂志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一份文史综合性双月刊，其凭借全国文史研究馆系统文史人才荟萃的优势，努力开掘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以第一手资料披露中国百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内幕、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深受知识界人士，尤其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喜爱。

《世纪》杂志采用国际标准大 16 开 64 面，逢单月出版，2002 年、2003 年定价为 5 元，邮发代号 4-557。敬请您到当地邮局订阅。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不另收邮费）。欢迎来函免费索阅，务请写清通讯地址、邮编及收件人姓名，并附 1 元邮资，本刊即可寄赠一期杂志请您试读。

社址：上海市复兴中路 529 号《世纪》杂志社
邮编：200025 电话：(021)64740822 64675768

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

● 何 蜀

抗日战争中的 1943 年 4 月 15 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

中美合作所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

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 1941 年 9 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 年 1 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 4 月夭折。

以后,英国人在 1944 年又曾重新提出合作意向,其间,中统局想要插手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国民党内遭到阻止。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也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逞。

在 1942 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太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

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此外，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学员。原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文强先生就曾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发表于《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中详细记叙了他当年领导河南临汝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在中原大战中对日爆破有功及破路阻滞日军西进有功而受到嘉奖等情况。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

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说：“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由于这样一些历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了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了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便被算到了它的账上。

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吗？

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两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监狱。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其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在1949年9月至11月底，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对这里关押的以共

产党人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无党派人士(还包括军统局本身的“违纪犯”)在内的200余名政治犯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被认为是这两座监狱之上的总名称。其实,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如果说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白公馆就是其下属的监狱(或集中营),那么,关在里面的犯人是谁呢?难道是那些住在里面的美方人员吗?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邓又平先生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先生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到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三期33、34页)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

明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讲学。一日从重庆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由此可见,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那么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中美合作所特训班一例

在中美合作所的合作协定中,第四条规定:“作战与训练。为加强对日军后方游击战及破坏其交通、仓库、矿山,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为基

干,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供应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在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武器装备,暂定10万人”。(《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35页)

中美合作所自建立后,即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此外,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按成立的先后,在各班班名上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的番号,为了战时对外保密起见,则避开番号及特种技术训练的字样,仅冠以地名的称号,例如重庆训练班、南岳训练班等。

当时的各训练班负责人大多已经过世,有关档案材料因未解密而无法得知其详。但值得庆幸的是,担任过河南临汝训练班负责人的文强先生直到2001年10月下旬才去世。他生前对该班情况作过详细的回忆,写成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公开发表于《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上。笔者近年又多次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受聘到临汝训练班教学的美国教官,并非“法西斯特务”,而是反法西斯战场中的军人,前后共约40人,住在寺庙风景区东边几间房舍中。第一批军官来自北非战场,具有丰富的反法西斯作战经验,美方负责人先是道威陆军少校,后是杨格海军少校。由于美方人员的军阶偏低(文强当时是少将),他们不曾提出过在班本部设立美方副主任或其他副职的要求。双方合作甚好。

在临汝训练班,作为武装游击部队的一切基本训练,全由中方拟定计划实施,美方不加过问。但美方对参加训练的学员兵限制颇严,必须由他们派员亲自按花名册点名验收,凡身体病弱者多被淘汰。

属于美方施教的特种技术训练,主要是进

行较新式的轻武器装备如卡宾轻步枪、各种冲锋枪、三号左轮枪等以及软性炸药(可做成油条、烧饼状,可粘贴于被炸物上,用导电爆破,威力比TNT硬性炸药大5—8倍)的使用训练(这些显然都是属于陆军训练的科目)。美方通过翻译讲授各种武器及炸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约占一个月时间。然后像开运动会一般进行实弹、爆破演习,占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演习,逐个进行成绩考察后,确认及格者点名配发武器,否则,即淘汰或再受训练。

在训练中,这些美方教官只讲对日作战,从不涉及中国政治,因此并无“反共反人民”、“审讯政治犯”方面的训练内容。

中方负责施教的有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两门。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教材颇多,有国民党军自编的,也有八路军、新四军实施过的,抗战初期叶剑英等中共军事干部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编写的,还有外国的。政治课程的教材,是军委会政治部统一印发的小册子。

临汝训练班每期开学时,受训官兵都要举行宣誓仪式。宣誓词事先由政训组长拟好,印发给每个官兵填写,少数文盲也须请人代填,自己签名盖章或按指模。事后宣誓词还要由各队值星官收齐,送政训组存查。举行宣誓仪式时,全体受训官兵以大队为单位排成横队,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由政训组长带领,高举右手,一句一句齐诵誓词,誓词大意是:“余谨以至诚,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勇杀敌,歼灭日寇,尽到卫国保家及配合盟军作战之责,切实完成反法西斯战争神圣光荣任务。倘有违误,甘受最严厉之惩处。”宣誓完毕解散时,官兵照例要集体高呼:“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当1944年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豫湘桂战役的前期)时,临汝训练班全体受训官兵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纷纷请战,要求打过黄河去,美方官兵也纷纷向文强求见,请求参战。文强深知自身的职责是训练而不是指挥作战,但值此非常时期,却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即请来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会同美方负责人,开了两次紧急会议,然后具体拟出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大爆破的计划。两大爆破目

标,一是日方在新乡至开封之间黄河故道沙沟纵横地带修建的汴新铁路大桥;二是焦作煤矿。因为这一方案是经过班内中美负责人及部队长三方制订的,一经上报,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执行命令。

鉴于该任务要派出小分队在敌占区执行,美方人员化装行动不易,只好定于夜间实施爆破计划。在班中的美方人员全部出动。经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

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汴新铁路上的铁桥破坏了,我方无一伤亡,安全撤退。铁路大桥的破坏,阻滞了日军调动的速度,为我军政机关后撤争取了时间。为此,临汝训练班得到了传令嘉奖及实物和现金奖励。

回忆这一训练班的历史,文强先生以他亲身经历否定了那些把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的不实之词。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 锐	28.00	4.00
瓮中杂俎	廖沫沙	19.00	3.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5.00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	吴 江	11.80	3.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张湛彬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梁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张 化 苏采青	59.80	5.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15.00	3.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之一 六月雪	牛 汉 邓九平	25.00	4.00
之二 原上草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之三 荆棘路	牛 汉 邓九平	24.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叶剑英同志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在“文革”十年中同林彪、江青的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纪实的手法,客观翔实地记述了这场斗争的始末,展现出一代元戎的文韬武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是中共建党后70年党内是非曲折的大写真。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过不少悲剧,教训太深刻了,其主要表现就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使许多忠诚的战士在貌似革命的口号下做了无谓的牺牲,甚至使党内多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如三次“左”倾路线指导下的“肃反”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可以使我们警钟长鸣,不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无罪流放》本书是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五七干校”生活为主题的口述实录体专著。“五七干校”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是我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特殊遭遇、再生与自我反省的一幕。书中有张光年、吴祖光、屠岸等66位知识分子的亲历告白,它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 款 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鲁迅与左联解散

● 刘小清

1935年11月,时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后转到她手中的。发信人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而信是写给上海左联的。

左联是在结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邨等12人。瞿秋白、茅盾、丁玲等都曾是其重要领导人。

为什么给左联的信却由史沫特莱转交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也是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时在上海的中共文化委员会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遭逮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而他们此后又被迫分头隐蔽。至此,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此时左联党团书记为周扬。周扬隐蔽后,正常的组织渠道自然发生了阻碍。故而,外界与左联直接联系肯定是困难的,更何况长期在国外的萧三。

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因为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位美国人,她在国统区上海的自由度也是一般国内文化人所不能比拟的。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故而在这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

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颇感痛心。虽然鲁迅对左联是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以致最终选择超然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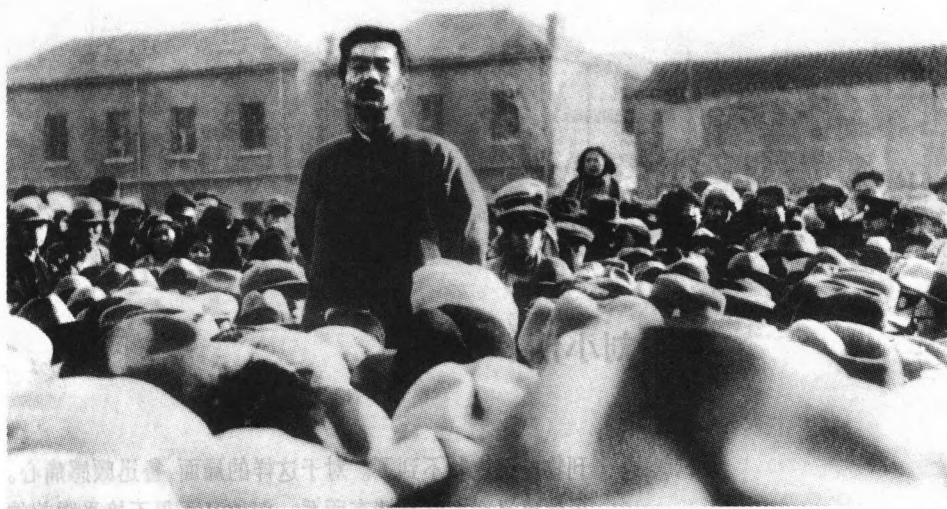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下,鲁迅收到萧三给左联的信。

萧三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整个左联运动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左联的解散。

“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萧三的信开门见山。他在总结左联五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中有不少之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如此剖析后,萧三的语气更为加重,“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



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想要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有感于此，萧三的结论为：“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性意见。虽然对萧三所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亦有同感，而且感触十分深刻，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决策，鲁迅并不苟同。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萧三的信留存。

事实上，鲁迅已经很久没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鲁迅在左联后期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以致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因为客观上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的隐蔽。因此缘故，转交信件的任务便落到胡风头上。

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由于胡风在左联的不正常遭遇，颇得鲁迅的理解和同情，加之胡风对鲁迅一直敬重有加而且始终追随左右，因而胡风成为左联成员中鲁迅一直较为信任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来信均有一种感觉，即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一个人意见。事实也正如他

们所感觉的那样，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故而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的一天，萧三与

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未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道：“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所含有的“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他对此很不满，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

此后萧三又专门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位以后给萧三以重大影响的代表即康生。

“他听我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要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他和我作了长谈，历举中国国内搞统一战线的成功。我退出后就写了那封长信寄回上海。”从萧三以后的这段回忆中不难看出，正是与康生的一番长谈，最终促使他写了这封解散左联的信。

事实上，关于这封信萧三亦很后悔。若干年后，他在提到这段历史时专门说道：

“有人说我屈服于王明写了这封信。我说，不如说我被康生这一套‘理论’说服为好。驻苏两个党的代表都如此主张，我怎能不于11月8日写那封信由鲁迅直转‘左联的同志们’呢。万里之外指使人们做事，本来荒唐已极，何况我当时也想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

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是更好吗?”

萧三这封来自于万里之外并且带有很好主观愿望的信件,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当时上海“文委”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九个月之久,故而,一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即“毫不迟疑地决定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夏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他们对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迷信以及希冀由此铺平建立更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道路。他们随即风疾雷动地开始了工作。

自然首先要征求各联盟的意见。当时有社联、美联、剧联、影联等进步文化组织。在取得一致的认同后,夏衍代表“文委”又先后与党外文化人士陈望道、郑振铎进行了接触。夏衍告知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并详细谈了拟解散左联以及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的思路。陈、郑二人对此均无异议。

当时夏衍认为党外文化界人士并不成为问题,“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赞成的。”而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征求鲁迅的意见。就像成立左联时必须听取鲁迅意见一样,如今要解散左联,也必须要尊重鲁迅意见。

关于如何见鲁迅,周扬、夏衍颇费心思。其中缘由,夏衍是如此道白的:

“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段时期,上海的文艺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巧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的确,对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事,通过什么方法去征求鲁迅意

见,我们也考虑了许久。”

夏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已经失去了较为融洽的谈话氛围。虽然同在左联,但心殊隔膜。而其时能够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合适人选即茅盾。

于是茅盾便负起了新的使命。

二

茅盾对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茅盾向鲁迅转达夏衍意见后,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但因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的口气显得很坚决,致茅盾一下子都不便再说什么。

继之,鲁迅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的这番话既深刻也透彻。正如左联成立时鲁迅在其报告中所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虽语出惊人,但确有警示作用。经过多少年的实践,鲁迅忧虑新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核心,“恐怕要被人家统了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茅盾闻之,亦深以为然。

最后,鲁迅特别强调了“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称左联是旗帜,说明他非常看重左联的地位和影响,即使它有很多令鲁迅不满的地方。

夏衍没料到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并且顾虑解散了左联,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于是,他便对茅盾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茅盾预料到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一时恐难协调,便不想多参与意见。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夏衍说:“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鲁迅,但我只做个传话人。”

以后鲁迅从茅盾处听到夏衍所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笑了笑说:“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非常清楚鲁迅此话的意思和分量。“我见鲁迅



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图为左联盟员王一榴会后作的漫画，反映了成立大会的情景

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我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而类似的教训我是有过的。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茅盾以后说过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他意识到左联现任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 and 鲁迅之间的这种裂隙是日积月累的，一时难以弥合。他不愿因此受到鲁迅的误解，从而影响他们之间私人感情。于是，茅盾便托郑振铎将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他自己没有再直接与夏衍见面。

由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解散左联的事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事已至此，似乎已成僵局。然而一个人的介入，却使解散左联的事出现了转机，也给了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以极大希望。这个人就是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青年杂文家徐懋庸。

三

徐懋庸踏进上海文坛是1933年的事。此前，徐懋庸为浙江临海某中学教师，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有介绍印度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的译作，并翻译有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1934年初，在时任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的介绍下，徐懋庸加入了左联。由于当时徐懋庸经常模仿鲁迅的杂文风格为《自由谈》撰稿，故尔颇得鲁迅关

注。在徐懋庸接办左联刊物《新语林》前后，鲁迅多次给予他指点，并寄稿件给他。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作序，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能有如此荣幸者似不多见。

这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并接替任白戈担任宣传部长。翌年，由于文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等被捕，由左联宣传部长改任行政书记的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随后便接任左联行政书记。当时徐懋庸年仅23岁。

此后，徐懋庸经常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而鲁迅当时之所以较为器重徐懋庸，是因为徐懋庸的勤奋。徐当时除了兼顾

左联行政工作外，还常有杂文和译作发表。鲁迅曾经批评过有些“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笔耕不辍的徐懋庸则颇多勉励和赞许。

正是由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上的这种特殊性，故当茅盾未能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在周扬眼里，徐懋庸则成为能够前往说服鲁迅的唯一合适人选。

徐懋庸与鲁迅的见面是在鲁迅指定的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他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对萧三来信的看法。

待徐懋庸讲完后，鲁迅平静地对徐说：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接着，鲁迅有些语重心长：“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鲁迅的这番话与对茅盾谈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核心是左联不能解散。

徐懋庸为鲁迅的一番话所折服。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

徐懋庸告别鲁迅后，左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徐懋庸汇报。会上，胡乔木代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

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文总”支持解散左联的态度,其基本理由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这次左联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最终一致同意解散左联。

随后,胡乔木又找徐懋庸谈话,要求他向鲁迅通报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并继续做鲁迅的工作。

这样,就左联解散问题,徐懋庸第二次衔命与鲁迅见面。

鲁迅知道“文总”和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后,对徐懋庸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沉默一阵后,鲁迅又突然补充道:“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由此可见,鲁迅将发表一个宣言看得很重。否则,左联解散的性质就有可能被误解。

徐懋庸终于如释重负。毕竟鲁迅已经同意解散左联了。徐懋庸随后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复命,在转告鲁迅意见时,特别强调了要发表一个宣言。周扬闻知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非常高兴,他认为鲁迅的意见很好,并答复等“文总”讨论后再说。

就在鲁迅以及徐懋庸等期待着左联发表解散宣言的

数日后,周扬约见徐懋庸,告知“文总”已讨论过了,因“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徐懋庸为此三见鲁迅。这次得到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又几天后,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

徐懋庸无奈四见鲁迅,说明情况。此次之行,徐懋庸心存忐忑,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然会引起鲁迅不满。

果然,鲁迅闻此变化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在这样重大的事情面前,如此草率地变化无常,不免心冷。可怜徐懋庸夹杂其间,窘迫异常。这次鲁迅的冷面,不仅是对周扬等人的,而且也包括为其充当说客的徐懋庸。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相对于它创建时的影响以及蓬勃生机来说,这样的结果鲁迅从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与鲁迅接触较多的左联盟员亦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左联解散的这种结果,茅盾也颇觉遗憾。他说:“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连宣言也不发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为在鲁迅看来,发不发宣言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情就因此弄僵了。从此,鲁迅对于周扬他们更加不信任了,对于他们的各种倡议、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左联解散,原来是为了方便成立新的更具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在此问题上意见也渐趋统一,但遗憾的是结果却不尽人意,而且因为左联解散前后的变化,导致鲁迅对周扬等人产生了更深的误会与成见,而这种误会与成见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新形势下向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荣选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中国气派 民族风格
大众意识 时代精神

★ 订阅本刊
可参加 20 万元抽奖活动
您有可能获大奖

《今古传奇》单月号
订阅代号:38-83
每册定价 9 元
全年 6 期 逢单月出版共 54 元

社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417 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 86797217 86782006
E-mail:jingq@public.wh.hb.cn



《今古传奇》一拖四订阅大全



单月号
订阅代号:38-83
每期定价:9元
全年6期:54元



双月号
订阅代号:38-373
每期定价:9元
全年6期:54元



故事版
订阅代号:38-349
每期定价:2.5元
全年12期:30元



武侠版
订阅代号:38-370
每期定价:3.8元
全年24期:91.2元

《今古传奇》

MOERN AND ANCIENT LEGENDS

《今古传奇》双月号
订阅代号:38-373
每册定价 9 元
全年 6 期 逢双月出版共 54 元

★ 订阅本刊
可参加 20 万元抽奖活动
您有可能获大奖

社址: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417 号
邮编:430077
电话:(027) 86782006 86797217
E-mail:jingq@public.wh.hb.cn

抢救重大人物生前身后事
揭秘历史风云圈内幕后情
以时代为职业以身份为荣耀
整理珍贵照片 重包浆发酸手乐
讲述事件生活 讲命运讲真实
可阅读可收藏 可读可品味可收藏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 杜林

远在1922年梁漱溟先生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时,作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驻守北京,他邀请梁先生在北京南苑基督教青年会,为其下属五个旅的官佐讲学,主要内容为儒家哲学与梁先生的政治主张,每次听讲限一个旅,由旅长率全旅官佐前往。当时的韩复榘还是个营、团级的官佐,他认得讲学的梁先生,但梁先生却不认识他。30年代初期,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梁先生在其治下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韩曾经提起过此事,极赞赏梁先生对儒家哲学的精辟阐述。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少时先念乡办初小,后读《四书》、《五经》,喜欢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字,曾当过县衙书吏,后追随冯玉祥将军,任过部队文书这类班、排级干部。由于打仗勇敢不怕死,加之深谙孔孟之道,得冯玉祥的器重而步步高升,成为冯手下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期间,冯部20万之众大部分驻扎于河南,一次冯玉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部队撤向潼关以西。而韩复榘却提出西北太苦,军队不宜西撤。冯玉祥历来治军极严,且以家长自居,当场给予训斥,命令已身为“一省之长”的韩复榘滚出会场,罚跪于会场外墙下。散会后,冯将军怒犹未消,又是一记耳光之后才叫韩复榘站起来。韩不堪其辱,便悄然率部分队伍前往山东。

1929年韩复榘叛冯之举,赢得蒋介石狂喜,1930年即任命其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统治山东八年的政治生涯。

梁漱溟等人原开办于河南辉县百泉之“村

治学院”,由于韩复榘的东走,冯军西撤,蒋军占领开封,学院被迫停办。

1930年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急于做出政绩,河南村治学院负责人梁仲华与韩复榘一谈,就立马表示欢迎“村院”全班人马到山东完成未竟事业。

1931年1月,韩复榘在济南接见梁漱溟、梁仲华时谈了他的“山东施政计划”,“二梁”也谈了准备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与要求,韩表示支持。于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设在邹平县,韩复榘以后也曾到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过考察。

邹平作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县,隶属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府任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邹平实验县是从社会、教育、经济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的;在菏泽办的研究院分院,对菏泽实验县则是从乡村自卫着手的。

1934年韩复榘增划山东省济宁专区等14个县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由梁仲华出任专员。研究院院长一职则由梁漱溟先生继任。

1935年10月,华北局势紧张,日寇策划之“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山东的乡村工作便迅速转为备战状态,首先采取集中训练八个学校的师范生下乡,分期分区训练、组织民众以抵抗日寇。

同年10月—12月,梁漱溟先生积极推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1935年—1938的“三年计划”,以对付日寇的入侵,为实行自卫作好

充分的准备。”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谈到，“1935年后山东乡村工作之大展开，则激于日寇侵略，悍然唱出‘华北五省（晋、绥、察、冀、鲁）三市（京、津、青岛）自治’口号而来，原计划以三年时间全省（山东）各县普遍设乡农学校为基层地方行政机关，并适应国防需要，负责当地壮丁的军事训练，惜只进行得70余县而日寇遂侵及鲁境，加以省当局自违其初衷而失败。”

1935年10月是“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酝酿最紧迫的时候，华北局势之恶化达于极点。这时，梁先生正在江苏无锡参加“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闭会后，10月17日路过南京时听到此事，他立即返鲁。为决定山东的进退必先探明韩复榘的态度。于是梁漱溟、梁仲华、孙廉泉三人在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之间，频频与韩复榘接触，韩当时表示坚决拒绝敌人的胁迫，日本关东军参谋曾多次飞济南胁迫韩复榘同赴平津开会，而他坚持不去。因此，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阴谋随之破产。

韩复榘当时积极采纳梁漱溟等人的有关国防政策的建议，计划于三年内山东全省分期分区推行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即在县以下，以乡农学校为下级行政机关，改善县政府组织，增设行政专员等。（二）“加强民众自卫训练”即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进行，高级训练则集中于行政区。但是计划却因战争而中止。

1937年梁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7月7日倭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之战，他一面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一面对韩复榘的不抵抗行为，多次进行说服，并向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作过汇报。实际梁先生的抗日宣传在“七七事变”前就早已开始。1937年5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四川省

政府主席刘湘，数次函电相邀入川，在成渝两地作了为时一个月、30多场演讲宣传抗日。6月13日梁在成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大会堂作题为《我们如何抗敌》讲演，他说：“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月梁先生首次访延安与毛主席长谈，其中抗日的“持久战观点”不谋而合。

1937年8月17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梁漱溟先生以“乡建派”领袖首次应邀参与中央一级的政治活动。会上，先生竭力主张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进行广大民众的抗日动员工作；并提出建议改革教育制度。蒋介石嘱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由梁先生负责草成交去。因上海沦陷，最高当局已无心于此而被搁置。



蒋介石（左）与韩复榘

当时,这个“最高国防会议”内设立的咨询机构“参议会”,蒋介石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人实际上是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参议员多为国民党人,也有中共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蒋介石虽然没参加会议,但却常约参议员个别谈话。蒋介石同梁先生除谈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问题以外,还交给一项陪同军事专家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的任务。蒋之派梁先生赴鲁显然是出于梁先生与韩复榘极其相熟的原因。

蒋百里与梁先生一行途经徐州时,驻军军长胡宗南到车站迎接。次日临行时,胡宗南约梁先生密谈,言及山东防务之重要,日军将从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协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并无取韩主席在山东之地位而代之的意思,一再请梁先生转致韩复榘放心。

抵达济南之后,韩复榘首先就见梁先生,一开腔就讲蒋介石已电告先生陪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究竟来干啥?梁先生解释:蒋百里是军事专家,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抗战防务。韩笑着问:“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先生将胡宗南密谈时再三嘱托的话转述了一遍。韩复榘冷笑摇头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他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梁先生回到蒋百里住处,转述了韩的话,蒋百里认为韩复榘的看法有道理,但作为中国军人,却应尽守土之责,而不能不打就撤。

据梁先生所知,在当时从南京的蒋介石,到类似韩复榘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大都认为在军事上由于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其差别在于,有的人深明大义,为守国土,抗敌寇而不惜牺牲;有的人则不敢拚命,不战而撤,丧失守土之责。同样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浩气长存;而韩复榘则私心重重,后来真的不战而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愧对中华民族。

梁先生认为,“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着重

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参见《梁漱溟答汪东林》,载《人物》1986年第6期)

至于抗战期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韩复榘的种种笑话,梁漱溟先生和韩复榘的老友、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冯玉祥麾下的兵站总监闻承烈等熟知韩复榘的人,都不相信这些笑话。韩是个军阀,有劣迹,但不是笑话所云的文盲、白痴。

1937年8月至10月初,梁先生穿梭于山东济南、济宁、邹平三地之间,为推进军民团结抗日而奔走。8月2日下午4时,韩复榘由南京返回济南时,梁先生于下午5时匆匆赶往山东省政府见韩。这时日本驻济南领事有野等三个日方人员已先入座,听说是电话召来的。据事后日方报载,韩复榘对日本人有野等发表了三项声明:(一)传说中央任命他为右翼总指挥不确;(二)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军事亦不实;(三)对未离济南之日本侨民继续尽保护之责。并布告市民镇定、禁谣,晓喻商家开门营业。显然,此时此刻的韩复榘,态度已有了极大变化。

10月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决定撤退也在这个时候。13日日寇下平原,达禹城,山东省府连夜紧急开会,决定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作人员迁移退往宁阳。14日清晨,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就急见韩复榘,惊问何故欲退?韩答,彼个人决不走,省府亦尚未搬家,唯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梁先生谓:如此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至宁阳。韩不纳。午间,许德珩、程希孟访梁,促梁再向韩劝阻,梁即再访韩言之,终不纳……韩既急切欲退,自不发动民众抗战,亦不复顾惜地方而只想将地方枪支、壮丁、财款带走。人心怨嗟离叛,惶惶不可终日。

10月26日,梁漱溟先生与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余心清、何思源等,于何宅共商给韩复榘的建议并草拟了几条:一般原则,亟应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乃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其中明确提出:“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韩复榘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等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收

用”。……

10月29日,梁漱溟先生带上三日前五人在何思源(现任民革主席何鲁丽之父)家商议的建议,借与韩复榘登千佛山细谈的机会面陈。从上午10时谈到下午3时,始终不见听。这是梁先生企图说服韩复榘坚持抗日的最后一次谈话,“以余(梁先生)推论韩氏态度由紧张而松弛,由光明而暧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

12月3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邀梁漱溟先生赴徐州,梁先生详谈韩复榘之变化情况,并请李宗仁“制止韩氏之撤退”。9日梁先生到武汉,曾于国防参议会上作一次报告。21日见蒋介石,“陈韩急切欲退之状,蒋(介石)公笑云:‘我全已知道。’”

日寇侵占华东、华北之后山东岌岌可危,梁先生亲自率领“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员工,于1937年12月下旬,从鲁西撤退带出1000余人,枪800多支,现金10多万元,大队人马停留在河南镇平县大佛寺,随后撤到武汉。梁先生去见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告诉他:“我们从山东撤出来,有这么多人和枪,我们还要回山东打游击战,打日本。”“我们对政府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给我们一个抗战的名义。”“他们给的名称是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我们决定回山东发动民众,积极抗日。”蒋介石告诉我(指梁先生自己):“已派于学忠去山东了,为苏鲁战区游击总司令。他带有2万多人,你回山东游击抗日,与于学忠配合。”这时的中央军委,下设的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而副部长则是中共的周恩来。

后来,梁先生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在河南镇平经过集训,便以“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的名义,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过黄河,返回山东抗击日寇。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我的努力是什么》和《敬告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同人同学书》这三篇文章当中,都相继谈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心情:“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



梁漱溟

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由武汉飞西安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漱溟先生是利用韩复榘在山东上任伊始“想做出政绩”,而将其视为改革中国社会,争取民族前途的“乡村建设”实验找到一个地方进行,正如他1927年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赴广州,他就曾试图在广东试办“乡治”,由于南方政局变动而未成。

而当时的中国有志之士,都在寻求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路。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师范,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县,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之乡村改革实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自治”试验及平民教育促进会设华北试验区等等,均为这类探索,梁漱溟之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亦然。

至于韩复榘由抗日到“不战而逃”,梁漱溟先生已尽力帮助、劝阻直至向当时的“最高当局”汇报,韩复榘之成为千古罪人,咎由自取;而梁先生之谋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拳拳之心,永远为人们所敬仰、称道。(责任编辑 吴思)

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

● 魏家骏



沈从文

自”1936年5月,《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沈从文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在文学道路上给了他种种帮助和鼓励的一些“特别值得记忆”的人,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徐志摩。沈从文深情地对读者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

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这段话,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作家之间的一段感人的友情佳话。

诗人做了一回伯乐

1922年夏末,20岁的沈从文孑然一身,从家乡湖南的湘西山区,来到了京城北京,想寻找理想,想读大学,想读好书来救国家。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哪里能够接纳这个从地方部队退役的穷困的乡下人?茫茫人海,举目无亲,他无法进大学,只好住在西西会馆里,每日到宣武门内的京师图书馆去读书自学。接着,他又搬到沙滩红楼附近的一所小公寓里,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时候,他开始练习写作,可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写啊,写啊,把稿子投往北京的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而这些稿子却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穷困和茫然中,他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与困窘。郁达夫在1924年11月12日的上午,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沈从文所住的公寓,亲自来看望这个哀告无门的文学青年。郁达夫请沈从文到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他掏出身边仅有的5元钱,付了1元7角的饭账,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沈从文。郁达夫不仅给沈从文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救济,解了

他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郁回去以后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寄给了《晨报副刊》，把沈从文所处的困境公诸社会。在这封公开信里，郁达夫用激愤的语气抨击了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劝沈从文丢掉大学梦和文学梦，因为那个社会已经容不得一个正直有为青年去走正直而高尚的道路了。这封公开信在《晨报副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在11月20日的《晨报副刊》第277期上就发表了一封署名“基相”的读者来信，表达了“只有多数无面包吃的人，来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面包问题”，才是青年的真正出路的见解和决心。

或许正是郁达夫这封信的作用，引起了《晨报副刊》编者对沈从文的注意。就在这件事发生一个月以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署名“休芸芸”）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郁达夫的公开信的呼应，因为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向A先生诉说自己苦况的信，而信写好了之后，竟然连邮费也没有，只好气恼地把信撕做两半。这应该看做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有了这样的开端，沈从文便不时有散文和诗作在《晨报副刊》发表。在此后的一年中，沈从文逐渐开始崭露头角，除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外，还在胡也频编辑的《京报·民众文艺》和其他一些刊物与报纸副刊上有创作问世。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笔，负责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之类稿件。上任伊始，徐志摩就在刊首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表示了办好《晨报副刊》的主张和信心。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列举了可以作为《晨报副刊》基本作者的一长串名单，其中在提到“新近的作者”时，沈从文的名字便已经赫然列于榜首，其推崇之意，自不待言。

这期间，沈从文和徐志摩已经开始有了直接的接触。有一次，沈从文拿了一叠稿子送给徐志摩，徐志摩把这一叠诗文稿件翻了一翻，问沈从文有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回答说：“全都是没发表过的”，徐志摩便把这一叠稿件全都留下。于是，在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开始的一个月

里，沈从文就在这份副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五篇作品。

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写于同年3月的一篇散文《市集》。这是一篇乡村集市的素描，人声喧嚷，猪羊嘶叫，汇成了一支生活的交响曲。沈从文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驾驭自己的笔，写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乡村生活场景，使都市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徐志摩是在前任编辑留下的一堆废稿中清理出这篇稿件的，他十分欣赏这篇散文，在编完之后，情不能自已地在文末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嫌嫌的梦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那热情洋溢的话语，包含着赞扬和鼓励，也包含着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期待。

不过，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在欣喜于得到徐志摩的赞扬之余，却又产生了些许的不安。因为这篇稿件先送到《晨报副刊》，因编辑未及时采用，后来被沈从文的朋友焦菊隐（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拿到他主编的《燕大周刊》上发表出来，接着又被胡也频拿去转载在他所主编的《京报·民众文艺》上，这时再在《晨报副刊》刊登出来，已经是第三次发表了。看到徐志摩所写的欣赏文字，沈从文一面感到“受来背膊发麻”，一面又觉得这“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他赶紧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说明事情的真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粗心，也表示了对徐志摩所给的褒扬的感激之情。

徐志摩对这件事却报以极度的宽容，他不仅没有责怪沈从文，而且还把沈从文的《声明》全文照登出来，并加了一段十分俏皮的附言：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挽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

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其中洋溢着对青年作者的爱护与宽慰之情,读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更有趣的是,这则附言中提到的那个“小兵”,竟然就是沈从文。几天以后,《晨报副刊》居然又将“小兵”的这篇短文揭载出来,可见徐志摩对沈从文是多么器重!

不做学生去做教师

1928年1月,沈从文为寻求在文学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时,徐志摩已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就在沈从文到上海不久,徐志摩同叶公超、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等人联合发起创办的《新月》月刊,创刊号于3月1日出版。沈从文除了在《新月》杂志上经常发表作品外,还在徐志摩参与创办的新月书店出版了《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好管闲事的人》、《沈从文子集》等小说集。

这时候,沈从文与徐志摩已经过从甚密,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徐志摩当时住在上海福煦路613号,沈从文经常去拜访徐志摩。后来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时间与徐志摩的交往时说:“记得两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饭,都是由后门进去,在灶披间同车夫厨娘一道坐下来吃饭的。他一面说笑,一面不住称赞雪里蕻烧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尔那次的锅塌豆腐还透味好吃。”

但是,文人的困境却始终像摆脱不掉的梦魇纠缠着沈从文。他尽管一本又一本本地出书,书店却只给他极微薄的稿酬,加上此时他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他同住,高昂的生活费用使沈从文不堪重负。他曾写信给徐志摩,诉说自己的苦况,徐志摩也曾劝他,“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接着,沈从文又想转而去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徐志摩的朋友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对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赞成,却萌生出了一个新奇的念

头:“你这样子还去念什么书?还不如去教书呢!”

原来徐志摩的朋友胡适,在1926年去欧美游历之后,此时正定居上海,除了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新月书店,还兼任着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于是,徐志摩就推荐沈从文到他那里去试试,看能不能做个教师。胡适知道沈从文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立即同意延聘他为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选修课。但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沈从文,哪里能够一下子上课?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讲稿,不到10分钟就讲完了,只得站在讲台上愣愣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学生,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此时在台下的学生中,就坐着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张兆和。于是,这段不成功的教师生涯,却造就了一段成功的美满姻缘。后来,沈从文谈起徐志摩的果敢推荐和胡适的大胆聘用,笑嘻嘻地说:“这可以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

千方百计营救胡也频

1930年秋,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为了不因自己离开中国公学以后影响沈从文的教席,他给沈从文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推荐给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西滢),并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还是去武汉大学,让凌叔华管你的生活吧!”沈从文便拿了胡适的推荐信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程。

1931年1月,学校放寒假,沈从文从武汉回到上海。此时,胡也频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也同丁玲一起逃离济南到了上海。他们俩回到上海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胡也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赴江西苏区参加大会。

1月17日下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在上海的临时住处清华同学会宿舍。他告诉沈从文,他和丁玲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搬家,但是却又到处借不到钱,偏偏正碰上房东的小儿子死

了,想送礼也没有钱,至少也该送一副挽联,表示一点哀悼吧。他请沈从文为他先拟好一副挽联,下午买了白布来请他写。沈从文因为要赴一个同学的约会,去四马路吃饭,12时许便同胡也频一起出了门,从四川路往南走。走到惠罗公司门前,胡也频说是要到先施公司买一块写挽联的白布,两人就要分手了。临分手时,沈从文看胡也频衣着单薄,在飕飕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又脱下自己新做成的棉袍给他披上,便匆匆告了别。

下午,沈从文应约赶到万宜坊胡也频的家,去写挽联,但胡也频还没有回家。晚上再去一趟,还是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再赶到他家,发现胡也频竟然一夜未归。沈从文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丁玲说:“别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他们哪里知道,与沈从文分手之后,胡也频在先施公司买好一块写挽联的白布,就去参加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何孟雄召集的一个会议。不料被特务察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

18日的晚上,沈从文刚刚回到家,就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来找他,老头自称是监狱里的牢头:“我受一个姓胡的先生之托,给您送个信!”说着便把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交给了沈从文。便条是用一张烂纸写的,上面写着: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沈从文一看便条,就知道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便条上说的“胡先生”就是胡适。沈从文找到胡适,胡适也很着急:“这不行,我们得想办法保释他出来!”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接着,沈从文又赶到胡也频家把这消息告诉给丁玲,丁玲请他去找李达帮助。在李达家里,沈从文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及施存统、朱谦之一起商量营救的具体办法。最后,大家认为还是请胡适和徐志摩出面,写信给在南京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请蔡先生出面营救。

徐志摩这时候正接受胡适的推荐,准备前往北京大学就职。在繁忙的准备和迎来送往的告别之际,沈从文给他带来了胡也频被捕的凶信。胡也频也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时就经常给《晨报副刊》写稿,到上海以后,又给《新月》杂志写过稿。徐志摩在政治上比较超

脱,他不以党派和阶级来看人,而只是看重在文坛上的友谊。因此他一听胡也频被捕,就激动地说:“参加什么党派,是个人的信仰,怎么可以凭这一点来抓人呢?”沈从文乘机向他提出请他出面营救的请求:“我知道先生素来抱有正义感,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请您设法营救的。”徐志摩毫不迟疑地拿出纸笔,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短简,请他在南京设法斡旋。

沈从文拿了徐志摩的信,便赶往南京,找到了蔡元培,但此时的蔡元培对这样一桩重大的政治案件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此后的几天里,沈从文在南京又先后找过国民党的元老邵力子,甚至还找过陈立夫,他们或者表示鞭长莫及,或者已经爱莫能助,时间蹉跎,在焦急与担忧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20天过去了,事情没有一点进展。2月7日,胡也频和他的几位战友一起,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的事件。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为了帮助丁玲度过



徐志摩

这段艰难的日子，沈从文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答应把丁玲的一本书稿推荐给中华书局，但因为稿子的篇幅还比较单薄，稿酬也就有限，徐志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他的妻子陆小曼提醒他说：“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转借一笔钱吗？你就说我有急用。”邵洵美是徐志摩在新月社中的文友，因为办书店，善经营，还编辑出版多种杂志画报，是文人中最有钱的一个。果然，邵洵美借了一笔钱给徐志摩，徐志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沈从文。几天以后，沈从文就伴送丁玲和胡也频留下的遗孤，假扮成了夫妻，历尽艰险，送她们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常德。

经过这将近一个月营救胡也频的风波起伏，徐志摩突然萌发起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的灵感，这就是发表在是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3卷11期上的《瑯女士》。在这篇小说里，徐志摩巧妙地借“瑯”谐“丁”和“玲”，暗示“瑯女士”即“丁玲女士”。他以胡也频为原型，塑造了“繁”这一革命者的形象，表现出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的愤恨和铲除穷苦的决心。在瑯女士的身上，则表现了她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斗志。而瑯女士的女友，显然写的就是沈从文为此事奔走呼号的活动。她抱病四处奔波，为营救繁而忍受权贵要人的冷眼，细心地照顾着瑯女士和她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表现出了一个急公好义的高尚正直的灵魂。从这篇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出徐志摩对沈从文的钦佩与赞许，也可以看到徐志摩对革命者的新的认识与理解。

绵绵不尽的思念

沈从文因为营救胡也频，接着又护送丁玲母子返回故乡湖南常德，误了学校开学的日期，便不能再回武汉大学去了。当年夏天，他接受了杨振声的邀请，去杨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

就在开学两个多月以后，11月21日，沈从文和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边吃茶边聊天，突然接到从北平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如同一声晴天霹雳，原来是关于徐志摩不幸遇难的噩耗。沈从文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就任教职，常来往

于北平和上海之间。这一次回上海是搭乘的张学良的专机，11日回到上海后，18日又匆匆忙忙赶到南京，准备再搭这架专机飞回北平。不料蒋介石要留张学良多住几天，而19日的晚上，林徽因要给外国人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答应过一定要出席的。一向重视朋友情谊的徐志摩不愿意失约，便临时决定用朋友赠送给他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免费乘机券，搭“济南号”邮机飞往北平。谁也没有想到，飞机飞到济南附近，遇到了大雾，撞在山顶上，飞机立刻燃起大火，坠毁了。徐志摩和两位驾驶员同时遇难。

沈从文听到这一噩耗，五内俱焚，他想起徐志摩在这六七年间对自己的关心与帮助，无论如何也应该去见最后一面。他提出马上搭夜车去济南，与恩师告别，大家也表示赞同。乘了一夜的火车，沈从文于20日的上午赶到齐鲁大学，会同了从北平赶来的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从南京赶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一起赶到临时停放灵柩的一座小庙福缘庵。这座小庙已经被一个卖陶器的商人用来做堆放货物的货栈。走进庙门，便可以看到徐志摩的灵柩就停放在墙边。两个工人挪开了棺盖，只见徐志摩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经过整容，头上戴着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子遮盖不住右额角上被撞开的一个李子大小的斜洞，鼻子略略肿起，门牙全部被撞脱。身上穿的是浅蓝色绸袍，外罩着黑纱马褂，脚上穿的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

看到一个历来热情似火、生龙活虎般的诗人，安静地躺在这又破又小的古庙里，被一堆五颜六色的坛坛罐罐包围着，门外便是喧嚣的街市，沈从文不禁感到了一丝凄凉与伤痛。直到三年以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情景，仍然流露出对徐志摩的不尽的思念。他说：“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责任编辑 吴 思）

一首当代名诗及其作者之谜

● 袁小伦

笔者近日阅读《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辑周而复的《往事回首录》，想起一些诗坛旧事逸闻，并由周文提到的以为是郭沫若所作的一首诗想到这首诗。

周而复详细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评、江青对郭沫若的迫害和郭沫若如何与江青一伙的斗争以及如何用诗歌回答毛泽东的批评。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1页载，毛泽东在1973年8月5日，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秦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上述周而复《往事回首录》在提到毛泽东这首诗（只是个别字眼和标点有所不同：改“魂死”为“虽死”、十批加上引号、封建论加上书名号）后写道：妄想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的“江青知道毛泽东同志这首七律后，认为机不可失。1974年春天，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江青当着周总理的面，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胡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模一样。大家知道，‘四人帮’名为批林批孔，实际矛头是指向周公。”“在这次大会以后，江青伙同张春桥闯到郭老的家里，再次批判郭老……江青要郭老批判吕不韦，实际上是影射周总理，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批周公的罪恶阴谋。郭老听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听出弦外之音，洞悉他们的诡计阴谋，痛加批驳，毅然拒绝。江青和张春桥无理纠缠了整整三个小时之久，不能不悻悻走了。”“对于江青和张春桥的罪恶阴谋和无理纠缠，郭老可以严肃顶住，但毛泽东同志的七律：《七律·

读〈封建论〉——呈郭老》，不能置之不理，他考虑再三，反复斟酌，不得不写出一首七律，回答毛泽东同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駉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趋。’”（《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辑第43—44页）然而这首诗的作者真是郭沫若吗？请看以下相关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绳诗存》第21页载有胡绳作于1972年7月的《偶感》：“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疗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逃绳墨，思竭駉骀效策驱。犹幸春雷动大地，寸心粗觉识归趋。”将此诗与前面周而复回忆中的郭沫若诗作比较，内容几乎没有差别，就像双胞胎一样，同出一源，只个别诗句稍有不同。例如“云水”与“云海”、“神方”与“仙方”、“疗俗骨”与“医俗骨”、“出穷隅”与“困穷隅”、“樗栎”与“樗栎”、“逃绳墨”与“悲绳墨”、“粗觉”与“初觉”、“识归趋”与“视归趋”。为什么会这样呢？《胡绳诗存》第35—36页载有胡绳写于1974年5月一首诗《两年前所作一诗传出于某大家手笔答友人问》：“拙句吟成偶自娱，惘诚稍借短章输。此身不是诗人种，鱼目何曾敢混珠。”

上海书店1993年版金韵琴著《茅盾谈话录》也谈到相关情况。金韵琴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弟弟孔另境的夫人，她称茅盾为“雁姐夫”，茅盾叫她“韵琴嫂”。1975年金韵琴应茅盾的邀请到北京，在茅盾家住了近半年时间。在这期间，白天茅盾常常和金韵琴闲聊一些往事，晚上金韵琴又将白天谈的东西记在日记里。这就是《茅盾谈话

录》的由来。是年7月28日日记载：“在雁姐夫卧室的五斗柜里，有一个抽屉，存放着别人寄给他的诗词。他自己写的诗词也存放在里面，给人写条幅的时候，就在这只抽屉里取出来挑选。今天，他把抽屉里的全部诗词稿件取出来给我看。”“我一一翻看，沉思辨味。在这些诗词中，冯至与胡绳的诗稿最多。”“雁姐夫对胡绳的诗，也很赞赏，说他用典自然。他拣出一首胡绳于1972年在干校写检查时写的没有题目的七律诗。”茅盾拣出的诗和上述《胡绳诗存》的《偶感》只有二字不同，即“云海”与“云水”，“移俗骨”与“医俗骨”。接着茅盾指着诗句，给金韵琴讲解：“第一、二句典故，说的是骊龙颌下有珠，人龙穴的人如果得到此珠，就成为有大智慧的人。这里的所谓‘珠’，实质是比喻马列主义的真谛。首联大意是说，虽然学习马列主义30年了，然而未获得真谛。颌联中的‘神方’，是指毛泽东思想，‘蛊毒’，是指形左实右。颈联上句‘樗栎’，典出《庄子》，但反其意而用之，故言‘岂甘’，言‘逃’，表示自己不甘自居废物而逃避思想改造（绳墨）。下句是拿成语入诗，说自己虽不及骏马，却仍愿竭尽绵薄以供驱使。结联首句‘春雷’，是指文化大革命，次句是说：从此心里略为（粗觉）认识方向（趋归）了。这首诗用典十分自然，也构成词语组合上的音韵美。”（《茅盾谈话录》第80—81页）

后来金韵琴写信向胡绳请教这首诗的来历以及作者本人对这首诗的看法，并于1983年2月27日得到胡绳的复信。日记中附带摘录了胡绳的这封来信：“1972年6月我还在干校。根据规定要写一个3千字的给中央的‘检讨’，在我写的这份‘检讨’的末尾就以这首诗结束。这个‘检讨’，是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来确是送到了，因为否则郭老不会看到。不过这首诗是怎样传到郭老那里，我就知道了。1973年6月我回到北京。在次年二二月里就有人抄给我看郭老的那首诗。据说有个朋友从郭老桌上抄得这两首诗，传了出来，因此当时有人误以为均为郭老所作。”“这首诗当然带有当时的形势和思想的烙印。不过我并不后悔写下‘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这样的句子，这首诗也表明当时确是并未得珠。至于‘犹幸春雷动大地，寸心粗

觉识归趋’，其实还在糊涂中也。”（《茅盾谈话录》第81—82页）

至此此诗来龙去脉大概明白了，本文开头写到的周而复《往事回首录》所说郭沫若1974年用诗歌回答毛泽东的那首七律的源头，应该是胡绳1972年在干校所作的附在给中央检讨书末尾的《偶感》。如果郭沫若真的用这首诗回应毛泽东的批评，那么是不是郭沫若看到胡绳的诗觉得不错，觉得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稍作改动以答复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郭沫若说“读书卅载探龙穴”不合事理。胡绳1938年加入中共，1972年说“读书卅载”，作为诗歌的概数语言说得通；郭沫若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加入中共，到1974年远远超过“读书卅载”。因此，明眼人仅凭“读书卅载”四字，也可断定此诗作者不是郭沫若。

（责任编辑 吴 思）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

● 张西帆

一身英气红脸汉，忧国忧民持正义。
一见欺人怒火起，打死暴徒走国去。
途经野观图暂息，急听地窖有人啼。
揭开盖板出少女，声称被劫遭此闭。
汉子要她放心去，弱女踟躇行又悞。
言道名京家关陕，欲归路遥却无力。
更怕再遇贼匪劫，生命难保无归宿。
汉子闻言义愤起，追歼群盗净环宇。
自身危难全不顾，舍己为人送千里。
感动京娘怀爱慕，几番隐语吐深意。
红脸汉子不为动，鸿鹄之志胸中系。
一番佳话垂青史，果是有宋第一帝。
历代兴亡同可鉴，得民失民无奥秘。
而今虽是新社会，此番常理仍应记。

欧阳修忠君误国

● 官伟勋

这是一桩历史公案。

由于公案涉及一位颇受景仰的文化名人，所以历来很少有人提及。偶尔提及，也说得客气。

被涉及者谁？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

欧阳修“露章劾”狄青

此公案需从《哨亭杂录》中一篇短文“宋武臣”说起，其原文如下：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任命他负责）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给皇帝上奏折同时予以公开发表者）劾之，至恐其有他心（担心狄青有篡位野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才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秦桧）得以诬陷武穆（岳飞）者，亦袭（是学了）欧阳故智也。”

狄武襄是何许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大将狄青。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善骑射。宝元初，任延州指使，临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所向披靡，屡立战功。范仲淹发现狄青是个难得的将才，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大将。范仲淹送他一本《左传》，他埋头读书学问大长。立了大功当了大官后，仁宗劝他除去“面涅”（兵士与犯人脸上的刺的

符号），他说留着可以激励士气，一直不肯去掉。皇佑四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率兵镇压侬智高，出敌不意，夜渡昆仑关，一举击平。史书称他：“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故出战常有功。”凯旋后升枢密使（宋代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与中书、门下并称文武二府），“旋被排挤去职。出判陈州而死。”

就是这样一位十分杰出的军事将领，对于一直有强敌压境的北宋来说，正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却被“排挤”去位而死！“排挤”者谁？欧阳修也！

《哨亭杂录》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欧阳修劾狄青这件事，在《宋史》与《续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以下是两书所载欧给宋仁宗的奏折：

“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书凡再上，留中不出。”（《续资治通鉴》1365页）

欧阳修的奏折主要有以下偏见：一是对“出自行伍”“遂掌”枢密的，显然有轻视歧视之意；二是虽说狄青任职三四年没有过错，但很“不幸”——他太了解军队的情况太得军心了；三、让这样一个人执掌军事，对国家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只有让文

人，让不了解军队不懂军事的人管军队才是于国家“有幸”的。

所谓“留中不出”，是说欧阳修连着打了几次报告，皇帝都没批照办。是不是皇帝也因狄青功大才高所以有些犹豫呢？不便瞎猜。但欧阳修的那句：“为国家消未萌之患”，肯定还是击中了皇上要害的，隔了不到一个月，朝廷还是“以熟状（宋代一种任命方式）出青（把狄青下放到州）判（以高官兼低职称判）陈州”了。

对于欧阳修干的这件事，一般书上都不提。不得不提时也说得客气，例如前几年出的大型历史系列丛书《五千年演义》“两宋春秋”篇中是这样说的：“狄青得胜回朝，任枢密使，自知慎重。但因他平日待人宽厚，每当他出门，总有许多士兵环拥马前，再加有人说他坏话，学士欧阳修便上奏，请皇帝将他调往外地。从此，他出判陈州。过了一年，病终于任所。”

《宋史·欧阳修传》，是不能回避这件事的了，但也只说：“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病情较严重），讹言籍籍（社会上流言蜚语很多）。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不仅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都说不上，还写成是出于对狄青的爱护了！

当然，《哨亭杂录》把欧阳修与秦桧相提并论也太过分了。欧阳修是

“阳谋”，秦桧是阴谋；欧只建议罢掉狄青的“国防部长”，降调地方任职，秦桧却将岳飞下了大狱置于死地；秦与敌国有勾结，欧只纯为赵宋皇帝的家天下想。两者的性质不同。但无端说只有把狄青赶出朝廷才能“消除国家未萌之患”，无论怎么说也是对狄青的严重诬陷与伤害，使狄青无辜地受了致命的一击！

要家不要国的赵宋王朝

欧阳修这么做，与赵宋王朝“得天下”的手段有关。

赵宋第一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怎么上台的？他就是靠手握兵权，趁他的顶头上司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不幸早年早逝，剩下孤儿寡母，以出兵为借口，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欧阳修画像

当上皇帝的。这正是有宋一代，一直忌讳武臣的病根所在。

因此，宋朝的历代皇帝，最看重或说最优先考虑的不是宋帝国是不是强大，而是兵权能不能牢牢掌握在我赵家手中。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林立。谁掌兵权，谁兵多，谁就能当皇上。这种朝代更替模式，从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到郭威，连续五代，代代如此。赵匡胤是第六代继承者。与前五代相同，他也是靠身任掌兵权的殿前都检点，才得以靠兵变当上大宋皇帝的。所以，他上台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防止兵权落入他人手中。由于有强敌压境，他不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用收缴和销毁武器的办法，而是对军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把天下的兵力都集中到京师，称“禁军”，也就是

专门警卫皇帝的“私人”军队。从而把军权牢牢地直接控制在皇帝个人手中。地方上，留一点把守城门的、看守草料场的老弱残疾，即所谓的“府兵”。府兵中偶尔出现个把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的，很快就会选调为京师禁军。司马光说过，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了。”禁军原来都在京师驻守，后来也派往外地。外派叫“出戍法”。二年一轮换或三年一轮换。家属均留京师，

实际上是人质。军官提升，必须离开原部。即所谓“师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因而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普遍现象。

后人对赵匡胤的这一套评论说：“宋太祖生于兵间，颇知五代藩镇之弊，故假杯酒解释兵权，使骄兵悍将无所用智，实为一代良法。然聚兵于京师，习为骄纵，而天下不复置兵，一有战乱，请兵于朝，故其国势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祸。”

评论还说：“宋自建隆、开宝后，民不知兵者一百余年，一旦金兵以飘迅之势，破京俘主，其势实不可与敌。”如此国防建设，靖康之祸自然是难免的了！

狄青被罢官的时候，正是西夏与契丹崛起，虎视眈眈欲取中原的时候。狄青死的当年，“夷人扰涪并监”，“火洞蛮依宗扰邕州”，“夏人扰宋边，败宋兵与断道坞”。1058年，“邵州蛮掠扰”。1059年，“交趾扰钦州”。1060年“交趾与甲洞蛮合兵扰邕州”。1070年，“夏大举扰宋”。次年，“夏陷宋抚宁诸城”。在西夏与契丹的不断侵扰的同时，东北又兴起了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

几十年后，金联合宋国灭了辽国，很快又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了北宋！太上皇宋徽宗、皇上宋钦宗，都当了金兵的俘虏。《续资治通鉴》称：“帝北迁（我国文人好面子，把帝王被俘北去叫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府库积蓄为之一空”，“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而泣”！

当时的情景的确是十分悲惨的。著于南宋的《容斋随笔》有一篇《北狄俘虏之苦》，是专讲这段遭遇的，原文如下：“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氏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每月支稗子五

斗,使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糗粮。岁支麻五把,令缿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男子不能缿者,则终岁裸体。”有的“虏”可怜这些在大冬天里,一丝不挂的男子,就让他们烧火做饭。这些裸体者,靠着火可以取暖,但出去到冰天雪地里取了木柴回来,再坐到火边时,“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有会手艺的俘虏受欢迎。来了客人,让他们表演,酒阑客散,就让他们坐在只铺有破席子的地上做手工。“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没有国,哪还有家?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对皇家来说,岂非更加如此?

北宋灭亡,二帝被俘,景况是那样的惨烈。逃到江南的赵家接班人宋高宗,该接受教训了吧?没有!他们刚刚退到越州一带,还没安顿下来,金兵还在饮马长江进攻扬州的时候,南宋君臣,不是忙着研究如何增强军事力量,如何抗战,反而着重研究起“驭将法”来。所谓“驭将法”,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军事将领,免得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太大,威胁赵家的家天下。翰林学士汪藻上奏给皇上的“驭将三法”,就是典型一例。《续资治通鉴》对汪藻的“高论”做了长篇摘录,其中关键的一段是:“然臣复有私忧过计者。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2877页)文中还点了岳飞的名,说他用国家的俸禄养了“数百人”,州县都怕他们欺侮,没人敢批评制止,其盗支的国家财物,多得没法统计!等等。

爱国将士在敌后艰苦拼死抗战,力图恢复失地。而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不是在想方设法给予支持鼓励,增强其抗敌力量;相反,却在挖

空心思算计日夜奋战的将领们,挑动朝廷对他们怀疑,尽量遏制削弱他们的力量!

汪藻的奏折传开后,“诸将皆忿”。有的将领就“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说文臣“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不是主张讲和就是主张割地。“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从而挑起文武臣间的严重对立,这对国防建设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赵宋王朝时期,没有像秦、汉、唐时期出现那么多声名煊赫的名将,偶尔出现个把优秀将领,不是被害就是被剥夺兵权,难得信任与重用,衰弱的小朝廷自然也就只好年年向“异族”低三下四地赔款进贡以求苟延残喘了!

白玉之瑕总是瑕

欧阳修除了在狄青身上干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以外,总的说来,他无论在为人上、在事业上,都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从小家境很苦,孤儿寡母,母亲靠做针线活把他拉扯大。他母亲识字,从欧阳修很小时就教他认字写字。买不起纸,就弄些沙土用草根在沙上写。做官后,史称:“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奸臣排挤范仲淹时,他曾勇敢地为之抗争。“虽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欧阳修诗文造诣都很深,在散文方面有“唐宋八大家”之称。

但在狄青这件事上,无论怎样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政治明星、文学明星很多,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文学家宋庠,著名词人梅尧臣,政治家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包拯,

都是先后同朝共事的名臣。韩琦任右司谏时,曾一本本参掉四个宰相与参政,自己也当过宰相、枢密使。包拯生于999年,逝于1062年,比狄青大9岁,狄青却早于包拯5年去世。包拯也当过枢密副使。这些同朝共事的人都没参过狄青。

欧阳修参掉狄青的时候,正是国家迫切需要武臣的时候。狄青却于华年抑郁而死,死的那年才47岁!

欧阳修为赵宋皇帝家算是想的够多了,为国家为国防事业想的太少了!

欧阳修的这一行为之所以应予以指出,是因为他的奏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欧阳参狄青的事,在当时在后来都没人加以批评清算,不能不说是南宋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宋刚亡,南宋尚立足未稳,敌后群众自发的抵抗运动刚刚兴起,抗战英雄刚刚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翰林学士汪藻就长篇大论地对付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了!我们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他的一些主要论点,甚至思路,都与欧阳修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是发人深省的!

北宋所遭遇的“靖康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唐朝安史之乱,长安失守,玄宗外逃,还有郭子仪等将领力挽狂澜收复失地;土木堡(今怀来西)之变,明英宗被俘,还有于谦等整顿军备,打退了瓦剌也先,保住了首都,稳定了大局。堂堂大宋,在危急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得力将领出来挽救危局,竟至一败涂地。为什么?这不能不从赵宋王朝一贯重文轻武(实际上是疑武排武)的政治路线上找原因。这个责任,当然主要应由赵家皇帝们来负;但作为国家栋梁之臣的欧阳修,没看到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不知道爱惜保护军事人才的重要,也是难辞其咎的!

“国无敌恒亡”！“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宋国一直有强敌压境，竟如此忽略国防忽略军事人才，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欧阳修确有他辉煌的一面，但在狄青的问题上他是理应受到指责的。有道是：“瑕不掩瑜”，这话不错。但瑕总是瑕，越是名人之瑕，越是应予指明。此非与名人为难也，是为“警来世者也”！

尽肃流毒在今朝

现在把这样一笔老账翻出来，不是跟欧老先生过不去，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警后世。

关键在于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臣民，应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还是应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

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封建专制家天下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历朝历代的臣民，基本上也都是这么看的。忠于君就是忠于国，忠于国就是忠于君。皇上与国家是不可分的。皇上是圣君，要拥护他。皇上是昏君，是胡作非为的暴君，也要拥护他，因为他就是“国家”。

不错，孟子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他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

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篇》）在孟子看来，只有在君主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才应把他看成国家的象征，否则就要批评他。批评他他不听，就把他“易位”，也就是赶下台，换个人来干。而像纣王那样的暴君，杀了他，也不是什么“弑君”，只不过宰了一个“匹夫”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有如此先进的民本思想是非常难得的。可惜，尽管孟夫子的著作，在封建时代也被列为“四书五经”之一，可他书中所表述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得到统治阶级，或说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发挥。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审查“教科书”时，看到了孟子的这些话，还十分震怒，不仅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掉，还声言：“这老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他不可！”朱元璋在世之年，通用的《孟子》读本，一直通用删本。

在整个封建时代，我们实际上走的一直是一条“社稷为轻，君为重”，诚惶诚恐，甘为帝王做奴才的路子。

这也就是欧阳修劾了狄青之后，为什么没人出来批欧，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的根本原因所在。

说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是不错的；然而，同样不错的是，产生旧意识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之后，旧的意识仍会继续存在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

帝制被推翻了，民国了，皇帝不存在了，但把忠于某个人，看得重于国家的仍然有人在。周佛海的名言就是：对于领袖“信仰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与他同时的一个大特务也说过：“哪

怕我们的领袖是王八蛋，我们也要服从他！”应该指出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奇言独行，实际上很多官场人物都是这么做的。

即使在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队伍中，也难免这种旧意识的侵蚀。尤其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要跟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身败名裂”，对领袖“就是要迷信，要崇拜，要盲从”，“崇拜不崇拜是个无产阶级感情问题，忠诚不忠诚是个态度问题”，“要永远忠于”什么什么人等论调吗？这种种论调，都是把革命者因工作需要而应有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堕落成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关键在于坚持以法治国。仅仅有个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在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时，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他说：“是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两点：一、制度是集体制定的。制度之能不好，可见旧意识影响的深度广度；二、要肃清封建遗毒，光靠说教是不行的，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人，再伟大的人，也会“被推向反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只要我们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严格遵守以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完善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民主最先进最受群众拥护的党！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 / 10 总第 127 期

欧阳修忠君误国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天天读”备忘录
亲历民权门恶战
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10 >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 元